

《维吾尔人》等三本书 问题讨论会讲话汇编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

D633.1

《新疆宣传》增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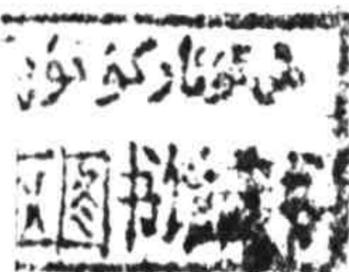
D633.1
(W)2
0080488

目 录

一、王恩茂在《维吾尔人》等三本书问题讨论会上的讲话.....	(2)
二、司马义·艾买提在《维吾尔人》等三本书问题讨论会上的讲话.....	(7)
三、宋汉良在《维吾尔人》等三本书问题讨论会上的讲话.....	(14)
四、铁木尔·达瓦买提在《维吾尔人》等三本书问题讨论会上的讲话.....	(30)
五、贾那布尔在《维吾尔人》等三本书问题讨论会开始时的讲话.....	(38)
六、冯大真在《维吾尔人》等三本书问题讨论会上的总结发言.....	(43)
七、《维吾尔人》等三本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错误的性质.....	(5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XT0-0080488



772191

王恩茂在《维吾尔人》等三本书

问题讨论会上的讲话

1991年2月7日上午

同志们！

在自治区党委领导下，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自治区新闻出版局组织召开的关于《维吾尔人》、《匈奴简史》、《维吾尔古代文学》三本书问题讨论会，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经过参加会议的自治区各民族的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宣传、教育、文化、出版、民族宗教工作部门的同志，特别是邀请来参加会议的林幹、黄盛章、周伟洲、王宗维、韩康信教授的共同努力，认真审读了吐尔贡·阿勒玛斯写的《维吾尔人》、《匈奴简史》、《维吾尔古代文学》三本书。用大量的、确凿的历史事实，揭露了吐尔贡·阿勒玛斯大肆歪曲、篡改、杜撰、伪造历史，散布民族分裂主义思想的丑恶面目，澄清了新疆历史上祖国统一与分裂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与破坏民族团结的大是大非问题，有力地宣传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新疆各族人民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的光辉历史。这有利于消除长期以来有的人散布的错误的、反动的东土耳其斯坦历史的流毒，有利于各族人民提高政治警觉性，进一步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维护祖国统一与分裂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与破坏民族团结斗争的严重

性，进一步认识到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斗争的重要性。这对于我们自治区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巩固社会稳定，保证贯彻中央和自治区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顺利实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胜利都具有重大意义。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取得了重大的收获。自治区参加会议的学者、专家、教授和各部门的同志，邀请参加会议的学者、专家、教授同志们，为这次会议取得重大收获，作出了贡献，我们要表示衷心的感谢！

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证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族人民就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吐尔贡·阿勒玛斯写的《维吾尔人》等三本书的要害，就是硬要歪曲、篡改、杜撰、伪造历史，把新疆和维吾尔族说成是大土耳其的一部分，大突厥的一部分。很显然，他的罪恶目的就是要对新疆独立，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制造舆论，妄图把新疆从我们伟大的祖国分裂出去，把维吾尔族人民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中分裂出去，推翻共产党领导，颠覆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把新疆各族人民推到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的深渊中去，遭受大灾大难，过着痛苦生活。用心何其毒也！

吐尔贡·阿勒玛斯写的《维吾尔人》等三本书，歪曲、篡改、杜撰、伪造历史，绝不是偶然的。历史上他是“东土耳其斯坦人民革命党”反革命组织的成员，曾经宣誓“要为东土耳其斯坦的独立而斗争”，他卖力地发展“东土党”成员，撰写了题为《我们伟大的祖国——东土耳其斯坦》及《我们身受的残酷灾难和摆脱它的道路》的反动文章，散布民族分裂主义思想，鼓吹新疆独立。他犯有反革命活动罪行，当时，没有依法给予应有的处理，还让他担任自治区文联专业作家。但他不仅没有悔罪自新之心，而且变本加厉写了《维吾尔人》等三本书，利用写历史的名义，更加恶毒地散布民族分裂主义思想，进行分裂祖国统一，破

坏民族团结的勾当。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根据历史的和现实的、国际的和国内的充分事实，反复证明，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国内外的民族分裂主义。因此，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是新疆各族人民共同的、重要的战略任务。在新疆的历史上就存在祖国统一与分裂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与破坏民族团结的斗争。这种斗争，解放以来一直存在着，有时还是很激烈的。帝国主义和国外敌对势力，是不甘心我国社会主义胜利的，他们经过较量懂得用军事进攻是推不翻社会主义中国的，于是他们对我国采取和平演变的策略，进行渗透、颠覆和破坏。新疆是我国的重要部分，是我国西大门的战略要地，是外与五个国家毗邻的边防线最长的重要边疆，是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多民族的全国最大的自治区，是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大有发展前途的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基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帝国主义和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渗透、颠覆和破坏，决不会放松对新疆进行渗透、颠覆和破坏。我们自治区曾经破获的“东土耳其斯坦人民革命党”、“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党”、“东土耳其斯坦青年党”等反革命组织，都是鼓吹新疆独立，成立东土耳其斯坦，要把新疆从我们伟大的祖国分裂出去，反汉排汉，要把汉族从新疆赶出去；他们都是散布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分裂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他们都是同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势力相勾结相联系，对新疆进行民族分裂主义的破坏活动。我们自治区各地连续不断发生的反革命标语、反革命传单，同“东土耳其斯坦人民革命党”反革命组织一模一样，也都是鼓吹新疆独立，成立东土耳其斯坦，要把新疆从我们伟大的祖国分裂出去，反汉排汉，要把汉族从新疆赶出去。我们自治区近几年来发生的多次反革命动乱事件，特别是去年巴仁乡发生的反革命武装暴乱事件，更是同“东土耳其斯坦人民革命党”等反革命组织提出的反动纲领，各地发生的反革命标语、反革命传单也都是一模一样，鼓吹新疆独立，成立东

土耳其斯坦，要把新疆从我们伟大祖国分裂出去，反汉排汉杀汉，要把汉族从新疆赶出去。吐尔贡·阿勒玛斯，从1986年至1989年写作出版的《维吾尔人》、《匈奴简史》、《维吾尔古代文学》，歪曲、篡改、杜撰、伪造历史，在意识形态领域利用写历史的名义，散布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同东土耳其斯坦人民革命党反革命组织提出的反动纲领，各地发生的反革命标语，反革命传单，近几年来发生的反革命动乱事件也都是一模一样的，鼓吹新疆独立，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分裂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吐尔贡·阿勒玛斯在意识形态领域利用写历史，散布民族分裂主义反动思想，制造新疆独立，成立东土耳其斯坦的舆论，分裂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反党、反社会主义，危害党、危害国家、危害各族人民的事实，又一次证明民族分裂主义是新疆的主要危险。民族分裂主义的危害是千万不能低估的，我们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是十分重要的，绝不能放松。

毛泽东同志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我们重温毛主席这一有名的格言，对我们提高警惕，克服麻痹思想，加强同制造民族分裂主义的反革命舆论作坚决的斗争是大有裨益的。

我们这次会议从审读、讨论、揭露和批判《维吾尔人》、《匈奴简史》、《维吾尔古代文学》三株大毒草中应该吸取深刻的教训。

我们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要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占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阵地，决不能让民族分裂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去占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阵地。稳定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思想是动乱的思想根

源，对民族分裂主义思想不反对、不批判、不根除，自治区的动乱将会是不止的，稳定将会是没有保证的。我们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同民族分裂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作坚决的斗争，决不能让民族分裂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自由泛滥。

我们宣传部门、社会科学部门、教育部门、文化部门、新闻出版部门，都必须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都必须认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民族观和宗教观，正确地宣传我们祖国的历史和我们新疆的历史。都必须高度提高警惕，提高政治责任性，防止、反对和清除民族分裂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在任何部门滋生、传播，以免它们去毒害各族人民。

我们必须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广泛深入地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各族人民的头脑。发扬各族人民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坚决反对民族分裂主义，保证各族人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亲密团结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内，坚定不移地、满怀信心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同心同德、一心一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繁荣。

司马义·艾买提在《维吾尔人》等三本书 问题讨论会上的讲话

1991年2月6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在经过广泛的调查、充分的研究和认真的准备之后，决定召开这样一次关于《维吾尔人》等三本书问题的讨论会，我认为很有必要。通过这种形式，有助于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辨别真假，弄清是非。对事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以对党、对国家、对各族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对待。对有害的、尤其属于政治立场和观点方面错误的著作、文章、言论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指出其错误，批评其观点，肃清其影响，而决不能听之任之，任其泛滥。自治区党委的同志要我也在这个会上讲一讲，我同意了。我今天主要讲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为了更好地维护祖国统一和各民族的大团结，必须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工作。

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已经充分说明，意识形态领域是一个重要的战线，是一个重要的阵地。政治战线、经济战线等方面的矛盾和斗争，会或明或暗地在意识形态领域得到反映。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目的，会极力利用思想文化阵地来表现他们的意志和

愿望。

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法律义务和共同愿望，但也有人由于种种原因，不仅不愿履行这一义务，甚至违背各族人民的意志，做有损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事情，其手法之一就是思想文化领域制造混乱，歪曲历史事实，宣扬错误的观点。

这种行为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它是和研究理论、研究历史、文艺创作等联系起来的。可以主观随意地引证资料，介绍别人的观点，并归纳为理论。加上有些人往往有作家、学者的身分，增加了欺骗性。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大有可能直接阅读那么多的历史著作和有关的原始材料，去得出自己的结论。读的是一些间接的、经过作者加工处理过的东西，这就很可能得出片面的、甚至错误的结论，很可能上当受骗。

错误的著作、文章和言论的危害性是很大的。虽然它不是物质的东西，它产生的危害不会表现为直接的物质形式，比如不会造成房屋倒塌、机器爆炸。但它的危害在人们的思想深处，把人的思想搞乱了、搞糊涂了甚至搞反动了，就可能出很大的乱子，因为人的行为是直接受思想支配的。物质的破坏是一次性的、明显的，精神上的破坏却可能是持久的、难以看见的。那些错误的观点成了比较系统的东西，不仅影响当代人，还可能影响下一代人，不仅在当时会有影响，而且可能长期发生作用。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于国内外存在敌对势力，存在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有时表现为尖锐复杂的斗争。这种斗争必然会反映到思想文化战线来。所以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足够的认识。对错误的倾向必须作坚决有力的斗争，决不能思想麻痹，心慈手软。

当然，由于这类问题的比较复杂，需要讲究政策策略和方式方法，努力做到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方法对头，讲求效果。对

《维吾尔人》等三本书的做法我是赞成的，因为采取了认真的、慎重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二、正确对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研究历史要考虑当前的现实。

实践表明，在民族关系方面，一些人宣扬错误的观点，往往在历史上做文章，对历史事实或是断章取义，或是加以歪曲；有的人还用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来影射今天的民族关系。我们有的同志也对研究历史问题存在一些不同意见，包括模糊认识。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就如何正确对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谈一些看法。

在考察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确立一些最基本的观点，那就是：很久以前（即秦汉时期）我国即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个多民族国家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各民族都为祖国的统一和发展，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创造和繁荣，为社会的安定和进步，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各民族的团结合作、友好相处和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始终是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统一、团结、昌盛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研究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的时候，一定要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地、准确地掌握史实，占有材料，客观地进行分析，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决不能歪曲历史、伪造历史，也不能将前人带有偏见的观点、甚至有错误的著作，作为正确的东西加以肯定、加以引用、加以宣扬。要真正做到“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

在遵循唯物主义观点的同时，还有一个如何对材料进行取舍的问题。把历史上东西摆在生活在今天的人们的面前，必须注意它的客观效果，必须考虑它可能对今天的民族关系可能产生的影

响。60年代，周恩来总理在审查《王昭君》这出戏的时候，讲了非常精辟的意见，他说：历史不能篡改，但写什么不写什么可以选择。我觉得这个意见对我们很有指导意义。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是好的，但也有支流。有友好，有合作，也有摩擦，有冲突；有团结，有统一，也有分裂，有割据。我们要充分地尊重历史，决不能把团结写成分裂，也不能把分裂写成团结。历史决不是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女孩。但写什么却是可以选择的，可以多写正面的东西，多写主流方面的东西，少写或不写那些可能对今天的民族关系有消极影响的东西。这样，就可以做到既尊重了历史，又考虑到了客观影响。我们国家的历史非常悠久，各民族之间亲密交往和合作的事例很多很多，各民族的优秀人物难以计数。可以研究、可以表现的内容非常广泛，可以大写特写。有些人却不愿写这些主流的东西，偏要写那些支流的东西，这是很令人奇怪的。

当然，并不是严格规定有一些东西就绝对不能写。还要看怎么写，在什么基础上写。需要涉及消极面的时候，应当对素材认真地处理，提炼它的积极意义，而避免它的消极作用。比如写战争、写分裂、充分写出他的破坏性、危害性，使人们有所启发，这当然是可以的。还有，一些问题作为学术问题，在一定的范围里实事求是地加以讨论也是可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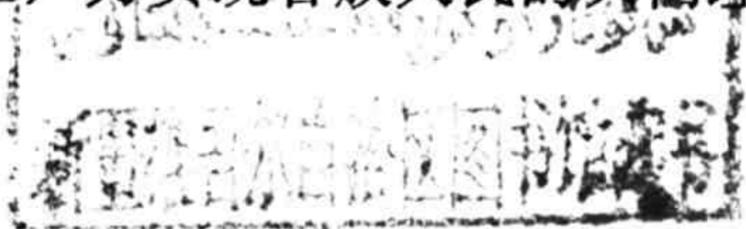
三、我们的文艺和理论工作者一定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崇高的使命感。

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和理论工作者，从事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工作，负有崇高的使命。我们必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各族人民服务，这是我们的根本宗旨，是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行动准则。

这是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要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前提。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所创作的作品，所写的文章，是为了让人看的，这就必须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考虑它对读者、观众产生的影响。会使人对历史事件产生正确的认识还是错误的认识？是宣传了正确的理论观点还是传播了错误的理论观点？是有利于社会发展、民族进步还是不利于社会发展、民族进步？是有利于祖国统一、民族团结还是不利于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等等。这是必须认真考虑、反复掂量的问题。必须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努力使自己的作品和文章对社会具有积极意义，能给各族人民以信心和力量，有利于国家的统一昌盛，有利于民族的团结进步，这样的作品才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这应当是每一个文艺和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赞成对自己的作品采取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只求发表出版，而不顾它的社会效果；我们也不赞成对历史一知半解、对事实缺乏了解便轻率地胡编乱写；我们更反对有人别有用心地编造历史和创作出版有错误倾向的作品。

建国以后，我们党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加上以前各个时期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支很可观的知识分子队伍，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他们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我对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有一种美好的感情，对他们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由衷地感到高兴。早些时候，《光明日报》向我约稿，说写什么都可以。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要专门就少数民族知识分子问题写一篇文章。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1月12日的《光明日报》上。在这篇文章中，我对我国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提出要尊重和信任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同时，各民族知识分子要充分认识自己担负的责任，为实现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而努力奋斗。特别要高举爱



国主义的旗帜，正确认识和处理祖国、民族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应当爱自己的民族，但更爱自己的祖国。因为只有国家的强盛，才会有各民族的繁荣，也才会有个人的成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不能忘记，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我在这里讲这番话的目的在于强调一下；我们的知识分子是民族中的优秀分子，对本民族的群众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从事的工作又是很重要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所以一定要有正确的立场，远大的眼光和宽广的胸怀，充分地认识和担当好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要旗帜鲜明，以实际行动去维护祖国的统一，去促进各民族的团结进步。

四、巩固思想文化阵地，加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工作。

从新疆、从全国的实际看，解放以后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方面，始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斗争，这种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一直没有停止。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的因素来考察，这种斗争还将继续下去，也将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进行下去。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要有必要的准备，要有适当的对策。

我们既要反对消极的、错误的东西，更要发展积极的、正确的东西。我们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去年的全国民委主任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在全国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民族观和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问题，李鹏总理还提出：“这种教育，要成为整个国家思想政治工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项工作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需要继续做好，有组织、有计划地步步向前推进，以求取得新的成效。有了正确的民族观，才能更好地观察和处理问题，就可以识别种种错误的理论和观点，就可以撕破各种标签和伪装。

在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民族观宣传教育的时候，尤其要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这关系到民族关系的未来，关系到国家的未来。那些错误的思想、理论、观点通过书报发表以后，往往会对青少年造成很坏的影响，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实际情况。在宣传正确思想的同时，也要注意剖析错误的东西，使青少年在比较和鉴别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提高自己的认识，从而能够在思想上筑起一道对错误观点的坚固防线，健康成长。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需要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互相配合。

要把文化工作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上，总结过去成功的经验，推广好的传统。我很赞成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意见，有组织、有计划地出版一批关于历史问题的著作。我们还要加强文化阵地的建设，要把各类文化设施利用好，尤其是基层文化阵地要巩固、提高，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逐步改变文化工作与改革开放不相适应局面。抓阵地、抓队伍、抓成果，使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开展起来，活跃起来，真正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思想文化阵地。

在意识形态里要坚持打持久战。不能有了风吹草动就手忙脚乱，风平浪静以后就万事大吉。事实已证明，意识形态里的斗争不可能一劳永逸。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并且不断研究和解决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始终掌握主动权，这样我们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宋汉良在《维吾尔人》等三本书 问题讨论会上的讲话

1991年2月6日

同志们：

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和自治区党委三届十六次全委(扩大)会闭幕不久,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局和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了《维吾尔人》等三本书问题讨论会,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首先,我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北京、内蒙古、陕西等省(区)、市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向参加这次会议的全体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致以亲切的问候和敬意!

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民委主任司马义·艾买提同志出席并指导会议,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刚才,司马义·艾买提同志作重要讲话,明天王恩茂同志、铁木尔·达瓦买提同志还要作重要讲话。他们的讲话必将对深入讨论三本书,正确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是有重要指导意义。

现在,我就为什么要对“三本书”问题进行讨论和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讲几点意见。

**一、“三本书”有严重的错误,对“三本书”
问题进行讨论是完全必要的。**

吐尔贡·阿勒玛斯所写的《维吾尔人》、《匈奴简史》

和《维吾尔古代文学》等三本书，以学术研究为名，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歪曲、杜撰历史，散布历史唯心主义和泛突厥主义，鼓吹分裂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的思想观点，为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闹独立、搞分裂提供所谓的“历史”依据，有严重的错误。

“三本书”是1986年10月至1989年10月相继问世的。出版发行后，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映。根据读者的反映，去年2月，区党委宣传部与新闻出版局、社会科学院领导研究后，组织了10余名通晓维吾尔语文的各族专家学者成立了审读小组，进行了初步审读，发现这三本书的内容有歪曲历史和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严重政治错误。之后，为了准确地、深入地研究三本书存在的问题，又组织一批具有专业知识的翻译人员将“三本书”全部译成汉文，打印成册，并于去年11月中旬至月底，召开了有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少数民族文学等学科的各族专家和有关领导同志共30人参加的审读会。与会同志用了整整半个月的时间，以科学的态度和高度负责的精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对这“三本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通过这次审读，对“三本书”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错误观点作了系统的、令人信服的剖析，并对新疆的历史、文化、古代的地理、居民以及维吾尔族的形成与发展作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的阐述。这对澄清近几十年来新疆历史研究方面的重大政治历史问题，是十分有益的，而且使我们对“三本书”问题的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刻，为开好这次讨论会进行了必要的准备。

从“三本书”的内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不顾历史事实，宣扬维吾尔族和所有生活在我国北方与西域的少数民族，历史上都不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它们是独立的，有自己独立的国家；否认中央王朝在西域和漠北地区的行政建制，断言古代中国的疆域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北是维吾尔人及其所谓的祖先、同胞建立的汗国、王国和帝国，它们与中原王朝从来就是“邻国关

系”。作者根本否定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友好交往、和睦团结的历史发展的主流，把历史上存在的种种矛盾和斗争统统说成是民族斗争，是国与国之间的侵占；把民族关系描绘成相互敌视、仇杀、吞并和不断战争的历史。对凡是主张和维护祖国统一、有功于民族团结的历史人物一概加以诋毁，斥之为“叛徒”，说他们“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而把历史上闹分裂、搞阴谋的人却颂扬为“民族英雄”。对于维吾尔族的族源问题，作者随心所欲地把古代北方的各少数民族都说成是维吾尔族的“先民”和“同胞”，并且毫无根据地编造距今8000年前维吾尔人就作为一个民族生活于“中亚”；距今7000年前，就有了农业经济，出现了畜牧经济和农业经济并存的局面；距今4000年前，就创造了文字，“开始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此拉长与扩大维吾尔族历史活动的时间和空间，毫无根据地夸大维吾尔族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在对待民族文化问题上，作者无视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事实，妄断维吾尔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之源，给了世界文化以“不可估量”的影响，是“世界文明最古老、最著名的黄金摇篮之一”，并且散布泛突厥主义的文化思想，鼓吹“共同突厥文化”的错误观点，等等。应该指出的是，“三本书”所承袭和鼓吹的严重错误观点，并不是作者的独创，而是与从新疆逃亡国外的泛突厥主义分子穆罕默德·伊敏于1940年在国外出版的《东土耳其斯坦历史》一书中所宣扬的分裂主义观点一脉相承的。可以说，“三本书”是《东土耳其斯坦历史》在当今形势下的翻版。

综上所述，“三本书”在维护祖国统一还是分裂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还是破坏民族团结、坚持马克思主义还是宣扬泛突厥主义等大是大非问题上，存在着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的严重错误。书中宣扬的绝不是学术观点的不同认识，而是代表了客观存在的那股泛突厥主义的社会思潮和国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政

治主张，迎合了国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破坏民族团结，进行分裂活动，妄图建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把新疆从我们祖国分裂出去的政治需要。

应当严肃地指出，“三本书”出版后，已在我区广为流传，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有的拿到“三本书”如获至宝，到处散布书中的错误观点；有的认为“三本书”所作的“学术贡献”不容否定；有些青年学生争相传阅，思想受到了毒害。国内外敌对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为“三本书”的出版拍手叫好，着手翻译出版，为煽动新疆独立，破坏祖国统一，制造反革命舆论。总之，“三本书”所散布的错误观点，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毒害着青少年一代，并为国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分裂活动提供了依据。因此，对“三本书”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大家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如任其自由泛滥，形成一种政治“气候”，那就会给国家的统一、各民族的团结、新疆的稳定和四化建设带来更为严重的危害。这正是我们为什么要召开这次讨论会的道理所在

自治区党委对“三本书”的问题所持的态度以及目前采取的做法是认真负责的、严肃的、慎重的。我相信，通过这次有这么多区内外专家学者和各方面负责同志参加的讨论会，对“三本书”的问题一定会有进一步的认识；对“三本书”鼓吹和散布的严重错误观点，一定会有更深刻的剖析；对长期以来在新疆历史问题上被少数人搞乱了的历史是非和模糊认识，一定会正本清源，得到纠正和澄清，进而为更好地从思想理论的深层解决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问题，为巩固和发展我区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实现新疆长期的稳定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二、必须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三本书”于1986年至1989年间相继出版并不奇怪，这不是偶然的，是近几年来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影响下的产物，是分裂与反分裂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突出表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全党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新疆同全国一样存在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种斗争又突出地表现为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与分裂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的斗争。这一斗争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今后也还将长期存在下去，而且有时还将是尖锐的、激烈的。这是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和国际背景的。大量事实表明，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国内外民族分裂主义。这些年来，国际上的反华反共势力和国外以艾沙集团为代表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与国内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相互勾结，大肆鼓吹新疆“独立”，阴谋建立“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企图实现搞乱新疆、搞乱全国，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的梦想。为了达到这一反动目的，他们或是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甚至策动反革命武装暴乱事件；或是从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进行渗透，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他们首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缺口，制造和贩卖种种错误的、反动的论点，把理论搞乱，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妄图用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占领我们的思想文化阵地。同时，支持和收买反革命分

子、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培植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作为他们推行“和平演变”的内应力量。他们的这一手如果成功，那么和平演变就难免会或迟或早地发生，牺牲了2000万人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就将被断送，后果就不堪设想。从当今国际阶级斗争复杂和剧烈变化的情况来看，这种“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已成为阶级斗争的最主要的形式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斗争比真刀真枪的斗争还厉害。我们还应该看到，无论是动真刀真枪，还是施展“软刀子杀人”、“水渗墙基”，敌对势力都要大造反动舆论。正如毛主席说过的：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回顾这些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现实，我们清楚地看到，国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为了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统一，就披着民族、宗教的外衣，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采取编写出版反动书刊，偷运反动宣传品，散发反动传单，秘密传抄《东土耳其斯坦历史》，到处散布反动言论等等手段，煽动分裂情绪，激起民族仇恨，鼓吹“新疆独立”。他们总是首先利用对新疆历史和民族历史的歪曲、篡改和伪造的惯用手法，竭力宣扬“我们的民族是突厥，我们的故乡是东土耳其斯坦，我们的宗教是伊斯兰教”，以此蛊惑人心，欺骗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们，策动闹分裂、搞独立。在这股思潮影响下，有些人发表了具有政治性错误的文章、文艺作品，甚至传播民族分裂主义思想的作品。当然，这与国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蓄意制造反革命舆论是性质不同的问题。但是，应该指出在意识形态领域传播分裂主义的思想观点，对一些人也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产生了很坏的政治影响，是导致分裂活动的思想基础，是一种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和危险。这说明意识形态领域这个阵地，无产阶级思想如果不去占领，资产阶级思想必然会去占领。

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的意识形态总是为一定阶级的统治及其经济基础服务的。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因为它是党的整个事业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经过1989年那一场严峻的政治风波和近几年来我们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我们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冷静地考虑一下未来，更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切实重视和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从我区实际出发，根据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对宣传思想工作，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加强了领导，把这方面的工作列入常委会的重要日程，并在多次召开的重要会议上作了部署，提出了具体任务和要求。应该说，这些年来，由于各级党委重视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也由于意识形态各个工作部门、各族干部职工的积极努力、辛勤工作，我区意识形态工作总的情况是好的，是有成绩的，为区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以及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时起时伏，并没有停息。被搞乱了的理论是非、历史是非，还没有得到彻底纠正；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鼓吹和散布的种种反动谬论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由此而造成的恶劣影响，也还没有彻底消除。如果我们不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不从思想理论上消除酿成动乱的根源，那就很可能还会发生新的动乱，其后果必将更为严重。因此，我们面临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是严峻的，斗争是长期的，任务是繁重的、艰巨的，还需要坚持不懈，做出很大的努力。

要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首先必须从反渗透、反颠覆、反和平演变的高度，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充分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要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做得好坏，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败，关系到党、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大事。各级党委和意识形态各个部门及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全体同志，都要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努力把意识形态工作做得更好，取得更大的成绩。

各级党委都要切实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一定要重视理论界、文艺界以及整个思想战线的情况、问题和工作”，“整个思想战线的工作都需要加强。我们要把这个问题郑重地提到全党面前，提到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的指示，各级党委的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抓、经常抓。要及时分析研究本地区本部门意识形态领域的现状、问题和动向，讨论解决重要问题，扎扎实实做好工作，要坚持“两手抓”，防止和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强识别和抵御的能力，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意识形态工作有独特的特点，涉及学科门类众多，情况比较复杂，因此处理意识形态问题，必须严格掌握政策界限，遵循有关要求。在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不能犹豫含糊，更不能听之任之，任其自由泛滥；要把有某些错误观点或有不正确认识的人同极少数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人严格区别开，对前一种人，要耐心教育，热情帮助，并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把他们团结起来；无论是批判反动谬论，还是纠正错误观点，都不能简单化，而应该摆事实、讲道理，有根有据，以理服人；对于需要解决的问题，要在调查研究、弄清真实情况的基础上，成熟一个解决一个，切忌鲁莽急躁，必须持重谨慎；对于学术上的问题，必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提倡和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提倡和鼓励学术和艺术

术上各种不同意见、观点、风格、流派自由发展和竞赛，提倡批评和反批评，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允许从容讨论，允许探索失误和保留自己的意见，不急于下结论，不强求都一致；解决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要注意方式方法，讲究实际效果，工作要做细，不搞大轰大嗡。

要加强对宣传、教育、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等意识形态工作部门的领导。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占领意识形态领域和思想文化阵地。这些阵地必须牢牢地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和执行党的路线的人手中。要积极关心和支持意识形态部门的工作，努力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要继续发挥新疆社会科学院、社科联、各高等院校和其他从事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在自治区两个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努力把新疆社会科学战线办成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办成适应新疆两个文明建设需要的科学比较齐全、学术水平较高的专业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三、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

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对于人类全部历史发展最科学、最正确的概括和总结，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它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提供了最好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成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作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科学的理论概括，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引导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地取得胜

利。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也很重视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当前重大问题的探讨和研究,作为一项紧迫任务,提到全党面前,并正在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党中央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和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也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文艺、历史、语言、民族、宗教、社会等学科。它的任务是研究并阐述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科学本质上是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利益服务的。社会科学这样的性质和任务,就决定了它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不能以其它任何一种思想体系作为指导思想。否则,就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

无数事实证明,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实际上从来也没有产生过完整的真正发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正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收集了片断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察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发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卡尔·马克思》,《列宁全集》第21卷第38页)。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对历史遗留下来的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及其所反映的历史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内在必然性及其客观规律,并把许多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使史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十年动乱之后,有些人在纠正“左”的、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提出了许多极其荒谬、极其有害的观点。《维吾尔人》一书“出版

社的话”称作者是“认真负责的”，“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对待历史”，“写出了我们历史的古代和中世纪的真面貌。”事实正好与此相反，作者完全不顾历史事实和已有的研究成果；肆意曲解革命导师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史的科学论述；对汉文史料摘其所需，甚至歪曲、篡改；甚至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随心所欲地编造史料。这些都说明，“三本书”并不是以马史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而是以唯心史观为指导，是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产物。这也从反面教育了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并阐述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对世界和中国、历史和现实所提出的各种重大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回答，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否则，就会偏离方向，就会犯极大的错误。

要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科学研究，首先必须具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充分信仰。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这种信仰是一种动力，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中国革命也搞不成功。今天，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不可能成功。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我们才能在错综复杂的政治风浪中，在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的侵袭下，保持清醒的头脑，维护社会科学的党性原则，用我们的研究成果引导人们按照工人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按照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去正确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为实现共同的奋斗目标，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

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要真正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科学研究，就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应该看到，这些年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和干扰，我们有一些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人的思想也很混乱，这种思想混乱归根结

底是理论混乱的反映。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也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相当一部分人都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实功底。这种状况不改变，要求他们自觉地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从事本学科研究，为党和各族人民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也是很困难的。而且，遇到有人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兜售反马克思主义的私货就难免上当受骗。因此，有必要强调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应该有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强烈的紧迫感和高度的自觉性。要把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和探讨政治、经济、历史、民族、宗教和社会理论等问题，作为一项紧迫任务，切实抓好，取得成效。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从事研究工作中，必须进一步树立和发扬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严谨治学的优良学风。学风问题，实质是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问题，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态度问题。“三本书”，在立场、观点上存在严重错误，反映在学风上也是与我们党倡导的优良学风完全背道而驰的。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一定要认真看书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在学懂、弄通、掌握、运用上下功夫，坚持不懈，循序渐进，日积月累，必有收效。科学研究工作是为探索真理所进行的艰苦劳动，同样有一个治学作风问题。探索真理是根据客观实际探索事物的发展规律，而事物的发展规律又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因此，不能有任何主观偏见，也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坚持和发扬优良学风。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具有为党和人民所欢迎的、社会效益好、学术价值高的研究成果。

四、要努力组织和壮大由各民族人员组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告诉我们，要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和各项任务；要巩固发展我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我区进一步稳定与发展；要深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地研究我区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与实际问题，并且澄清被搞乱了的理论是非，没有一支由各民族人员组成的坚定的、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是不可能的。这些年来，由于各级党委的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得到加强，在实际工作中已经涌现了一批政治思想好、理论素养高、业务能力强的理论骨干。他们在澄清理论是非，批判错误思想观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一支可以依赖的力量。这一点，在审读“三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证明。但是，从今后形势发展的需要来看，仍然不相适应，我们的理论队伍需要进一步发展壮大，充实提高，尤其是要充分重视和大力培养少数民族的理论骨干，采取切实措施，提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和专业学术水平，使他们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增长才干，发挥积极作用。

在理论队伍建设中，要重视对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培养。对他们在政治上要热情关心，工作上积极引导，业务上严格要求。并鼓励和组织他们深入基层，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促使他们更快成长。老同志在继续发挥作用的同时，对他们要搞好传、帮、带，使他们成为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的合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积极采取措施，把我区专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党校、实际工作部门的研究力量组织起来，紧密配合，协调行动，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专题研究，发挥整体作用。

各族理论工作者要充分认识自己肩负的重任，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要为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我区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取得更大的成就，充分发挥积极性、创造性，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希望你们通过辛勤的劳动，有更多更好的文章、著作、作品问世，来回答党和各族人民对于你们的厚望

五、要在干部群众中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团结的教育，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和文化观的教育。

通过“三本书”的审读和讨论，使我们认识到，要消除“三本书”的恶劣影响，一方面必须采取适当方式，对“三本书”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深入的和深刻的批评。在此基础上，要分专题约请专家学者撰写有说服力的高质量的文章，逐步消除由于“三本书”的传播所造成的思想混乱，统一人们的认识，增强团结，稳定大局。同时，还要组织力量对泛突厥主义分子穆罕默德·伊敏写的《东土耳其斯坦历史》，进行深入批判，肃清其流毒影响。这些工作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要用几年的时间把它列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大事抓紧抓好。另一方面，对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采取正面教育的方式，普遍地深入地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和文化观的教育，以达到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抵御和识别能力的目的。江泽民总书记去年在新疆考察工作期间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主要内容有一个概要的阐述。他讲了五点，这就是：第一，各民族不分大小强弱、历史长短、发育阶段高低，都应该一律平等，坚决反对任何民族歧视，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第二，各民族没有高低优劣之分，都有自己

生存发展的能力、优点和特点。我们的任务是要努力为少数民族提供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和条件，动员社会各方的力量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发展经济和文化。第三，民族差别、民族问题将存在很长很长时间。在民族未消亡以前，忽视民族差别和民族特点是错误的。同时，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间共同性的东西在逐渐增多，这是历史趋势。我们坚决反对人为地去消灭民族差别，同时欢迎和提倡民族间相互亲近，相互学习，大力促进和加强相互的经济文化联系和兄弟情谊。共产党员在密切联系本民族群众，热爱本民族，及时反映本民族要求和意见的同时，也要积极联系其他民族群众，热爱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中的所有成员，做促进民族团结的模范。第四，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在消除了阶级压迫、民族压迫之后，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和共同进步，是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的根本立场，也是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一原则所要求的。要按照国家扶持与自力更生相结合的方针，大力推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贫困落后问题，逐步达到事实上的平等。第五，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制度，《民族区域自治法》是以法律形式把这种制度确定下来的一项基本法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既能发挥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积极性，又保证了中央必要的集中和祖国的统一。我们要继续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五条既是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与行动准则。对于我们从事民族问题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了更好地开展爱国主义和新疆历史、少数民族历史的宣传教育，要抓紧编写、翻译和出版一批新疆历史小丛书。自治区教委要尽快组织专门的班子，为我区各级各类学校学生分别编写新疆历史教材，并纳入教学计划，使青少年从小就受到生动具体、

系统的爱国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各级党校、干校，也要在培训计划中安排新疆历史的教学内容，使我们的干部对新疆史、民族史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这对免受毒害，做好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是大有好处的。我们要一手抓好对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年学生的正面教育，并常抓不懈，让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逐步地扎根于群众和青少年头脑之中；一手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思潮的斗争，从意识形态中逐步消除产生动乱的根源。这样，我们就能形成一个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的强大的社会舆论环境，我们新疆的稳定发展，长治久安就将更有基础，更有保证。

铁木尔·达瓦买提在《维吾尔人》

等三本书问题讨论会上的讲话

1991年2月7日

各位专家、学者、同志们：

关于《维吾尔人》、《匈奴简史》和《维吾尔古代文学》等三本书问题的讨论会，从二月一日开始，到今天结束，开了七天。在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下，在与会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讨论会开得很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讨论会。在讨论会上，大家不仅深刻揭露了《维吾尔人》等三本书的严重错误，还实事求是地以理服人地指出了三本书的作者吐尔贡·阿勒玛斯的错误观点和立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抓经济建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同时决不放松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我们新疆，还要十分重视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只有维护了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才会稳定，才能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与会同志向讨论会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有些同志还在大会上作了重点发言，在小组会上讲述了自己的见解。现在，我借此机会，联系新疆实际，谈些看法和意见。

一、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离开正确的理论指导，必然走到邪路上去。

历史唯物主义是史学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理。历史是客观存在，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研究历史，认识历史。要坚持实事求是，去伪存真，来不得半点虚伪，更不能任意歪曲和隐瞒。在少数民族史研究中，我认为应该遵循以下几条原则：

第一，必须承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长期逐渐形成的史实，承认我国现今的56个民族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融合到其他民族之中或迁居他国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民族实体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过贡献。不论她的人口多少，历史长短，都是其中光荣的一员。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这个大家庭里，各民族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是平等的，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主人。我们通常说的，我国具有5千年的文明史，就是指休养生息在这块古老土地上和曾经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果。民族史的研究，必须尊重这个历史事实。总结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中各自所起的作用和做出的贡献，振奋民族精神，使每一个民族都为自己能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而感到光荣和自豪。

第二，必须坚持阶级观点，把以往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的旧帐算到各民族的统治阶级头上，增强各民族的阶级情谊。

在阶级社会里，民族内部是分成阶级的。各族劳动群众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他们都受到统治者包括本民族的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反对压迫，反对剥削，是各民族劳动群众的共同愿望和理想。这个理想只有到了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得以实现。“治国者以史为鉴，治郡者以志为鉴。”研究民族

历史，应该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那就是各民族人民必须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走共同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闹“独立”，搞分裂，破坏民族团结，好象是在为本民族说话，实际上是为极少数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地主老财们说话，他们绝不代表大多数民族群众的利益。

第三，必须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发扬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增强各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

我们今天生活的伟大祖国的这块土地，是各个民族共同开拓与捍卫的。为了开发她，中华民族的先辈们的汗水曾流在一起；为了捍卫她，他们的血又淌在一起。中国是中华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不是专指哪一个民族。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是中国，满人建立的清朝也是中国。中国的统一，各民族的友好合作，始终是占主导地位，这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在历史上，秦以后中国在政治上统一的时期占三分之二，分裂的时期仅占三分之一。而统一时期正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时期，分裂时期则是社会进步受挫的时期。和平、统一反映全国各族人民的要求。战争、分裂势必破坏生产力，因而是违背人民利益的。对于历史上的事件、人物，要看他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要看他在维护祖国统一上的贡献。总之，要看他是顺乎社会发展规律，推动历史前进，还是相反。尽管许多事情是很复杂的，不可以简单作结论。正因为如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标准。标准不同，对同一事物就会作出不同的评价。

第四，少数民族史的研究成果跟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及文艺作品一样，都是精神产品，必须对人民负责，尤其是要对本民族的群众负责。只能用无产阶级的思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去团结教育群众，鼓舞他们的斗志，自觉地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的统一，为实现我们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而努力奋斗。

当前，全国各族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就是一心一意搞建设，就是实现中共中央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的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谁要搞干扰，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涣散人心，谁就把自己放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各族人民群众都是不会答应的。

二、吐尔贡·阿勒玛斯的三本书是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歪曲了新疆的历史。三本书的要害，是否认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鼓吹独立，煽动分裂，为民族分裂主义炮制历史依据。

由于吐尔贡·阿勒玛斯把立场站错了，所以，他在《维吾尔人》等三本书中，公然否认新疆是祖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公然否认维吾尔民族是祖国大家庭中的成员。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维吾尔人》等三本书在一些问题上有意对读者隐瞒事实真相；在另一些问题上，则公然歪曲和杜撰历史事实与历史情节，欺骗读者，在讲述新疆与祖国中原地区历史关系的时候，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

《维吾尔人》等三本书中根本没有提新疆与祖国中原地区政治上的联系，经济上的往来和文化上的交流。

在政治联系方面，他向读者隐瞒了反映新疆与祖国中原地区关系的一系列重大事实。例如《维吾尔人》有意不写汉朝在天山南北设置西域都护府，唐朝在天山南北设置安西都护府，元朝在天山南北设置北庭都护府等历史事实。

与此同时，《维吾尔人》等三本书对于体现了新疆与中原地区历史关系的张骞、班超以及解忧公主、细君公主等在天山南北的历史活动，则肆意进行诋毁。

古代我国北方的草原地带生活着许多游牧居民，他们为开拓祖国疆域，发展和繁荣当地的社会经济，推动社会进步，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他们的历史活动是中华民族历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个地区的政治舞台上，先后扮演过重要角色的有匈奴人，鲜卑人、柔然人、回纥人以及突厥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他们与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共同创造祖国的历史，是祖国大家庭中当之无愧的成员。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伟大祖国的历史进程中所建立的历史功勋，都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政权格局上的集中与分散反复出现，集中的时候表现为中央集权的形式，分散的时候则呈现出地方分权的形式。于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政权形式，或交替或并存的现象就成为我国历史的一大特点。就其演变经历而言，这种交替或并存的过程是一种回归和解体的过程。就其内在趋向而言，回归中央集权是普遍追求的目的。因此，不论是从时间的意义上讲，还是从空间的意义上讲，地方分权的形式都不能构成我国历史的主流，构成我国历史主流的是中央集权的政权形式以及由中央集权造就的统一政局。

《维吾尔人》等三本书基于否认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目的，把我国古代北方居民的历史活动置于我国历史范畴之外，将他们建立的政权说成是独立于我国之外的政权，他杜撰历史，意在鼓吹独立，煽动仇视。他对那些相悖于自己政治愿望的历史人物大肆诽谤，诬蔑他们是“叛徒”、“傀儡”和“跳梁小丑”，对于那些认为可以为他所用的历史人物则狂热吹捧赞颂，美化他们是“民族英雄”、“爱国主义单于”。这完全是对历史的歪曲！

歪曲这段历史就是歪曲我国民族关系史，肢解中华民族历史，为分裂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制造历史依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维吾尔人》等三本书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与泛突厥主义思想的代表作《东突厥斯坦历史》是一脉相承的，在许多问题的表述上，可以说《维吾尔人》等三本书就是《东突厥斯坦历史》的翻版，完全抄袭了三、四十年代泛突厥主义分子麦斯吾德、伊敏、艾沙的观点。并没有新东西。

《东突厥斯坦历史》的核心内容是鼓吹突厥至上，宣称突厥有近万年的历史活动时间，有数万里的历史活动空间，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民族，建立过一系列强大的政权。而《维吾尔人》等三本书则宣称维吾尔族有八千年的历史活动时间，有东起太平洋，西到黑海，南到印度北部的历史活动空间，说维吾尔的先民和同胞在历史上建立过十一个强大的帝国、汗国和苏丹国。

《维吾尔人》等三本书与《东突厥斯坦历史》一样，也把长城看成是中国的国界。以此为根据，《维吾尔人》等三本书在说到中原地区政权与我国北方古代民族政权关系的时候，公然使用“中国军队”、“中国公主”这样的概念，把北方民族在长城以内的政治活动，说成是“在中国建立政权”，把他们在长城以内的军事活动，说成是“侵入中国疆域”，同样，把中原地区政权在长城以外的军事活动，说成是“侵入”别国的疆域。这一切清楚地表明了《维吾尔人》等三本书与《东突厥斯坦历史》在宣扬独立、鼓吹分裂上是完全一致的。

三、《维吾尔人》等三本书的出笼，是新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严重的斗争，必须认真地抓，抓到底，彻底肃清它们的社会影响。

三本书所散布的错误观点，搞乱了一部分人的思想，毒害着一些涉世不深、对历史情况了解不多的青年，在社会上造成的不良影响和后果是严重的。

这三本书的炮制和出版，不是偶然的。它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策略和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新疆的反映。自治区党委就曾经明确指出：民族分裂主义是新疆的主要危险。从这三本书中暴露的问题来看，从去年4月的巴仁乡的反革命武装暴乱来看，进一步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从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九年，三本书的公开出版发行，给我们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首先，我们的各级领导一定要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切实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少数民族史学问题等等，在新疆具有很强的区域特点，具有重要意义，加上外来敌对势力的渗透，使这些问题更为复杂。对此，回避是回避不了的。重视它，解决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才会得以顺利进行。

其次，各民族干部，尤其是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一定要学习一点新疆历史和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史。学习点历史，你就会增强免疫能力。不仅自己不受病毒感染，而且还能到群众中去消毒。区党委正在为大家创造条件，编写一套历史丛书。供各级干部、群众学习。

第三，在中学和大学的历史教学中，一定要使用国家统编的教材和参考书，同时要加强对新疆历史的统编工作，并尽快地把它列入教学课程。这几年，在历史教学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问题，使学生受到了一些不良影响。因此，对历史教学要作一次认真地清理。要对学生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历史观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加强民族团结的教育，并禁止教员在学生中讲述与历史教学大纲相背离的错误观点和错误材料。违者要追究责任。今后，还要进一步加强各种书籍特别是历史书籍的出版管理工作。

各位专家、学者、同志们，不久以前，自治区党委召开了三届十六次全委扩大会议，认真传达、学习、讨论了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讨论了《自治区党委关

于制订新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召开自治区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是开创未来十年的重要会议，是动员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奋斗的重要会议。全会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确定了今后十年和“八五”期间的奋斗目标、基本指导方针。

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不仅勾画出了我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宏伟蓝图，而且也给自治区今后的发展带来了十分有利的机遇。这些机遇是：一、国家产业政策支持发展的能源和原材料，正是我们新疆的优势。二、国家决定对石油工业实行“稳定东部、发展西部”的战略方针，已经把塔里木盆地、吐鲁番盆地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列为国家的重点。随着油气资源的大开发，必将带动我区整个国民经济的大发展。三、国家决定把轻纺工业的粗加工和内销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逐步转向内地和原料生产地，这将极大地促进我区以农牧产品为原料的轻纺、食品工业的大发展。四、国家决定对沿海加工地区和内地资源地区实行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方针，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对我区缩小和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带来了希望。五、国家还进一步重申了积极扶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方针，我区将继续得到国家和先进省区给予的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的支持，这必将加快我区经济发展的步伐。

经济是基础，稳定是前提。二者是辩证的统一，相辅相成的，没有经济的发展，就没有政治稳定的物质基础。实现今后十年我区的稳定和发展要靠各族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要靠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大有希望。我们一定要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稳定和发展的指导思想，象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国际反动势力的颠覆、渗透和破坏，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贾那布尔在《维吾尔人》等三本书

问题讨论会开始时的讲话

1991年2月1日

同志们：

经过长时间的认真准备，吐尔贡·阿勒玛斯撰写的《维吾尔人》、《匈奴简史》、《维吾尔古代文学》三本书问题讨论会今天开始举行。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有我区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少数民族文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有自治区和部分地州市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同志、宣传部长及自治区宣传、教育、新闻出版、文化、民族宗教、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等部门和单位的负责同志。五位来自北京和兄弟省区的知名专家也应邀参加了我们的讨论会。在此，我代表自治区党委和会议领导小组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共计140余人，收到论文40多篇。自治区党政领导也特来出席今天的大会，这体现了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对我们这次讨论会的关怀和重视。

这次讨论会是在自治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早在去年年初，包括三本书在内的一些书刊在人们的思想和社会上造成的不良影响和危害，已引起了区党委的关注。自治区党委为了贯彻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深入开展反对资

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切实加强我区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组织力量，认真抓了书刊整顿和“扫黄”工作。去年3月，区党委宣传部、区党委政策研究室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对自治区教育、文艺、出版、音像制品、社科理论等部门近几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民族分裂主义与反对分裂主义斗争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了解。从调查的情况看，自治区意识形态领域总的形势是好的，维护和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导地位与指导作用，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得到了认真宣传、贯彻和执行，舆论导向是正确的，宣传基调是健康的。但是，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影响下，也确实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民族分裂主义的思想表现，这方面错误的思想、观点、在近年来公开发表的一些诗歌、小说和学术著作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表露和反映，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维吾尔人》等三本书。它歪曲新疆历史，散布民族分裂主义观点、危害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问题是严重的。去年5月7日、8日，党委常委会议听取了有关书刊问题的汇报。会上区党委常委进行了认真讨论，王恩茂副主席，宋汉良书记都作了重要讲话。常委会上强调指出，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对三本书在思想和社会上造成的危害不能低估。人们的行为是由思想支配的，错误的思想将会导致错误的行动。意识形态领域的不稳定是最大的不稳定。要稳定，关键是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干部和群众。为此，要做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对三本书问题的处理，也应这样。这次常委会以后，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冯大真同志召集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就如何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审读三本书问题作了具体部署，并立即组织力量，于10月以前将三本书的维文本翻译成了汉文，这为我区各民族的专家、学者和有关领导深入研究和审查三本书创造了有利条件。去年11月15日至11月30日，自治

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自治区新闻出版局组织召开了三本书审读会。我区各民族的专家学者和主管部门的负责同志共30人参加了这次审读。通过审读，大家对三本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错误的性质，初步形成了共同的认识和意见，并向自治区党委写出了审读报告。去年12月13日、14日，区党委常委会听取并认真讨论了审读报告，区党委常委同意审读会关于三本书的主要问题及其错误性质的分析，也同意下一步的安排意见。我们这次讨论会就是根据区党委常委会议的安排部署召开的。

三本书不顾我国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和历史发展的主流，把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篡改成分裂动乱和各民族间相互对立不断争战的历史，把历史上的维吾尔族说成是独立于中国和中华民族之外的一个民族，这是很错误的。三本书所表述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及其明显的政治倾向，是不利于维护祖国统一，不利于民族团结，不利于新疆稳定和建设事业的。而这些错误观点和思想，又是通过学术的形式在史学和文学著作中表现出来的，因而有它的复杂性和更大的蒙混性。三本书问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新疆地处祖国边疆，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维护祖国统一与分裂祖国的斗争，存在着维护民族团结与破坏民族团结的斗争。尤其是近些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更为尖锐激烈。国际上的反华反共势力和分裂主义势力，都在千方百计地在新疆进行分裂和颠覆活动。在自治区内，受国际大气候的影响，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分裂祖国统一为目的的反革命阴谋活动，近些年来有所抬头，煽动民族独立的政治案件时有发生。在此背景下，曾多次发生闹事事件，直至发展成去年的“4·5”巴仁乡反革命武装暴乱事件。吐尔贡·阿勒玛斯撰写的三本书，于1986年10月至1989年10月相继出版，正是上述国内外大小气候下产物，是分裂与反分裂斗争在

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突出表现，是从深层次上毒害人们思想，危害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鸦片，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警觉和重视。还需要指出，三本书所提出的错误观点，并不是作者个人的独创，而是早已逃亡国外的泛突厥主义分子穆罕默德·伊敏解放前写的《东突厥斯坦历史》（即《东土耳其斯坦历史》）一书在当今形势下的翻版。吐尔贡·阿勒玛斯承袭和鼓吹的错误观点，代表的是一股泛突厥主义的社会思潮，我们不应把它仅仅看作作者个人的问题。三本书作者的问题再次提醒我们，《东突厥斯坦历史》一书的错误观点，几十年来远未得到认真清理，其流毒至今尚在社会上蔓延。我们必须认真地清理《东突厥斯坦历史》一书和《维吾尔人》等三本书所散布的错误观点，彻底批驳泛突厥主义和打着“东突厥斯坦”旗号的民族分裂主义，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尤其要针对我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特点，把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持之以恒地抓下去。

召开这次讨论会的目的，是通过认真研讨，对三本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错误的性质进行深入剖析，以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澄清长期以来一些人在新疆历史问题上存在的种种模糊认识，批驳极少数人在新疆历史问题上的极其错误有害的观点，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同时，对今后在全区干部、群众中如何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民族观的教育，进行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教育，将作出新的部署和安排。

考虑到区内外的专家学者为这次讨论会作了充分准备，提交了不少高质量的论文和报告，我们在会议程序的安排上，准备以大会发言为主，中间适当安排几次小组讨论，以便与会同志能够更为广泛地交换意见和看法。为了开好这次讨论会，现提出如下希望与要求：第一，讨论会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民族观对三本书的问题和错误进行科学

地、实事求是地分析，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第二，要牢记“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这一党性原则、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都要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观察和认识问题，对于不利于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作品和思想理论观点，不论它是出自于那个民族的，都要坚决反对并旗帜鲜明地予以批驳。第三，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讨论会将本着弄清问题，分清是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使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共同商讨。对于处理意识形态、思想理论方面的问题，决不能简单从事，必须十分谨慎，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以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第四，要求大家集中精力，集思广益，开好会议。要遵守会议纪律，注意内外有别，注意材料保密。

同志们，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是开创未来十年，动员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奋斗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在刚刚结束的自治区党委三届十六次全委（扩大）会议上，认真传达、学习、贯彻了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和中央领导的重要讲话，讨论了《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可以说，贯彻落实好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是区党委三届十六次全委（扩大）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今后全党的中心任务，也是党的宣传和意识形态部门的首要任务和工作主题。我们宣传和意识形态各部门，一定要认真贯彻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立足于把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做好，做出显著成效来，始终保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舆论导向，从而进一步有力地推动自治区的政治稳定、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推动自治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断巩固和发展。

冯大真在《维吾尔人》等三本书 问题讨论会上的总结发言

1991年2月7日

同志们：

为期七天的《维吾尔人》等三本书问题讨论会今天就要结束了。这是近几年来自治区意识形态领域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在自治区党委的直接领导和与会专家们的共同努力下，会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和民主讨论的原则，对《维吾尔人》等三本书的主要政治错误，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达到了分清是非，澄清认识，统一思想的预期目的。会议开的是成功的。

对于《维吾尔人》、《匈奴简史》和《维吾尔古代文学》三本书的问题，自治区党委是很重视的。在这次会议之前，有关部门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早在去年2月，区党委宣传部就根据读者的反应和区党委的指示，组织少数民族专家对三本书进行了调查和初步审读。后来，又将三本书译成了汉文。去年11月15日至30日，根据区党委的部署和三本书的作者吐尔贡·阿勒玛斯的要求，我们又集中了以新疆社会科学院为主的多民族的近30名有关专家、学者和领导，再次对《维吾尔人》等三本书进行了审读。内蒙古大学林干教授等全国几位著名的历史学和民族学方面的专家，也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参加了审读。通过审读，向区党

委提出了关于《维吾尔人》等三本书的审读报告和审读意见。在这期间，自治区党委于去年5月和12月，先后两次召开常委会，专门研究讨论了《维吾尔人》等三本书的问题和专家们的审读意见，自治区党委的主要领导同志都作了重要指示。这次《维吾尔人》等三本书问题讨论会，就是在过去一系列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召开的。这说明，自治区党委对三本书问题的处理是非常严肃、非常慎重的，处理方法也是非常稳妥的，因而赢得了各民族专家、学者、知识分子和干部群众的广泛支持。

这次讨论会，是一次历史问题的讨论会，又是一次正本清源、拨乱反正，针对三本书存在的严重错误的批判会。到会的各民族的专家、学者和部分领导，本着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态度，既实事求是、又严肃认真地批评了吐尔贡·阿勒玛斯所著三本书的严重错误，在涉及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新疆历史等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因此，讨论会的召开，对于澄清几十年来在新疆历史研究方面存在的许多重大问题，对于端正一些同志长期以来存在的糊涂认识，教育和挽救青少年一代，对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培养、锻炼我区多民族的社会科学理论队伍，进一步从深层次上解决当前不利于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思想理论问题，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且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在讨论会期间，全国政协副主席、自治区顾委主任王恩茂、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民委主任司马义·艾买提，自治区党委书记宋汉良、自治区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以及区党委副书记贾那布尔等领导同志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林干教授等几位专家也不远千里，前来参加会议，并作了很重要的发言。领导的讲话和许多专家的发言，对于我们是一个巨大的支持和鼓励。这里我谨代表自治区党委和会议领导小组，向内地来的几位专家和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向参加会议的各位代表表示

衷心的感谢！

下面，围绕着三本书的问题，我再补充讲几点意见。

一、《维吾尔人》等三本书的主要错误

经过几天的大会讨论和小组发言，同志们对《维吾尔人》等三本书的错误观点，进行了分专题的、全面系统的、有理有据的批评和驳斥。正象有的同志所说的，《维吾尔人》、《匈奴简史》、《维吾尔古代文学》这三本书，是曲解篡改以至杜撰史料伪造历史的三本书；是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历史观的三本书；是不利于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为民族分裂主义制造所谓历史根据的三本书。对三本书的问题，只有在深入剖析其错误，辨明事实真象的基础上，才能撕去其学术研究的外衣，教育干部，教育群众。

三本书的错误很多，正象林干教授所讲的是错误百出。有学术思想上的错误，有理论观点上的错误，也有研究方法上的唯心史观的错误。但是从政治上考虑，我认为三本书的错误，突出地表现在下面三个问题上：

一是作者否认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事实，硬要把维吾尔族和我国古代北方诸游牧民族及其所建立的地方政权，说成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独立国家”。

维吾尔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它的历史就是我们伟大祖国历史的一部分。在它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与中原汉族接触频繁，且深受汉族的先进封建经济文化的影响，而它的经济文化也同样影响了汉族。这些都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

但是，三本书的作者却无视历史上一些重大的史实，居然把维吾尔族历史写成了一部“独立史”。比如，古代维吾尔族在漠北建立的鄂尔浑回纥汗国，总共十五位可汗其中就有十一位是受

到唐朝册封的，这是回纥汗国臣属于中央王朝的铁证。对此，作者只字不提，反而说什么“极为强大的、独立的回纥——鄂尔浑可汗国，在当时同亚洲的大国——唐朝和吐蕃处于平等的地位。”喀喇汗王朝众多的可汗自称（“桃花石”汗，本来是表明自己是中国的可汗，喀喇汗王朝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点，在作者高度评价的《突厥语大词典》里也解释的清清楚楚。但作者却歪曲“桃花石”一词的含义，硬说“桃花石”不是指中国。对于西迁回纥一支——甘州回鹘在甘肃建立的地方政权（即三本书作者所谓的“坎苏回鹘汗国”），仍然按照回纥汗国时期的惯例，在新可汗继位时，向中原王朝报聘，请求册封这一史实，被作者说成是“实际上坎苏回鹘汗国与中国的王朝之间不存在任何从属关系。”“中原地区的统治者由于根深蒂固的唯我至尊的传统，把毫无意义的爵位赐给了回鹘汗国。”

单是这样还不够，作者又把诸如欧洲匈奴帝国、白匈奴帝国、伽色尼王朝、大塞尔柱苏丹国、花喇子模国等与古代维吾尔人没有关系的一些所谓“国家”，与回纥汗国、喀喇汗王朝混在一起，凭空杜撰说维吾尔人在历史上曾经建立了十一个“伟大的、强有力的、富有的、文明的国家”的结论，并以此证明自己编造的维吾尔人自古以来就是独立于中华民族之外的神话的真实性。

而且不仅如此，在《维吾尔人》和《匈奴简史》中，作者还多次说过，中国的疆域北不过长城，西不过黄河。在作者笔下，中国就等于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不仅维吾尔族不是中华民族的成员，而且连匈奴、乌孙、大月氏、鲜卑、柔然、突厥等我国古代北方众多的民族，也都不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他们生息和活动的地方及其所建立的地方政权，也都不是属于中国的疆域，而是与中国并列的、独立的“国家”。这是对历史的极大歪曲。

二是作者无视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极力渲染历

史上各民族之间相互敌视仇杀和吞并的支流，把我国的民族关系史歪曲成为一部战争史。

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是我国各族人民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和睦共处、相互交往、共同发展的过程，它构成了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其基本内容就是各民族日益接近，互相吸收，互相依存，共同缔造了我们这个多民族的统一的伟大国家。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民族关系，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和交往上，很多时候并不是和谐地发展的，而是伴随着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有时甚至表现为互相争战。但是，若从民族之间战争的时间与民族之间和睦相处的时间相比，则后者要比前者长得多。所以我们说，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统一、团结、交流、进步，是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写历史就要实事求是地去揭示我国历史发展的这个本质的方面，做到有利于今天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巩固和发展，而不是相反。这才是历史学家的崇高责任。

但是，三本书的作者却站在错误的立场上，着力渲染历史上定居的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战争的意义，忽视或者避而不谈历史上定居的汉族人民和游牧民族之间存在了许多世纪密切的经济和文化上的相互联系，有意把中国的民族关系歪曲成为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战争史，特别是歪曲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在作者笔下，中原地区的汉族政权与古代各少数民族之间除了不断的征战之外，就是在和平时期也始终处于充满敌意的、对立的关系之中。因为，中原汉族政权“若要安然放心，就不能允许自己周围哪怕有一个比自己强大的国家，就要让自己周围的国家都臣服。”所以，汉朝将王昭君嫁给匈奴单于，在作者看来是“匈奴与汉族之间的半友好关系”。突厥与唐朝的关系，作者说是：

“这两个邻邦就是在安宁时期，相互间的‘友好’来往也没有诚意”。作者还说：“回鹘亦都护汗国同宋朝的关系，表面上是似

乎和睦友好，实际上彼此难以发生影响”。等等。

更令人不能理解的是，三本书的作者有意歪曲史实，费尽心机编造的中原政权及汉族人的所谓挑拨离间和背信弃义。东汉时的班超，在西域活动三十多年，为国家统一和西域地区的和平积极奔走，作出了重大贡献，也深得当地人民的爱戴。但三本书作者却说什么：“班超利用塔里木盆地诸维吾尔汗国相互之间的矛盾，挑动双方互斗，使他们互相争战，导致多次流血。”作者还把东匈奴与西匈奴、所谓的“土拉”和鲜卑与匈奴之间的战争，都说成是“由于汉朝的挑拨离间”，还告诉人们：“尽管东匈奴在击溃自己的骨肉兄弟西匈奴时拼命地为汉朝效劳”，但后来自己却“终为曹操所灭”。在历史上，明明是回纥为了摆脱突厥汗国的统治，曾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并不断联合唐朝反抗突厥，最后建立了回纥汗国。但三本书作者却胡说什么“突厥人的敌人”，也即是唐朝“想方设法，千方百计让回纥人反对突厥人”。在讲到鄂尔浑回纥汗国崩溃后南迁回纥的命运时，作者不是按照史实去讲唐朝妥善安置南迁回纥的情况，而是带有煽动性地说：“唐朝不讲信义，另有谋算”，不肯出兵帮助恢复回鹘汗国，对曾经出兵援助过唐朝的回纥“背信弃义。”还说，西迁回纥“汇入当地同胞之中”，而南迁回纥的“命运甚惨，所信赖的邻人加害于他们。”总之，作者的基本观点是，“用野蛮的外族消灭野蛮的外族”是中原汉族政权“传统的对外政策原则”。诸如此类。这哪里是在写历史，分明是在借古讽今，恶意地煽动挑拨，制造民族不和。

三是作者对待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不作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完全站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去观察和评价民族关系中的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维吾尔人》一书“出版社的话”，说三本书的作者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对待历史”。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阶

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我们分析研究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必须遵循的一个科学方法。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透过错综复杂、迷离混沌的历史现象，把握历史发展的本质及其客观规律，对历史作出科学的回答。而三本书的作者恰恰不是这样。由于作者站错了立场，观点不对头，结果对我国多民族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作了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分析评论。

比如，如何看待我国历史上民族之间的战争问题，这是关系到能否正确认识历史上的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问题，在历史上，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所有的统治阶级，不论是地主阶级还是游牧贵族，出于其阶级利益，都要不断地向外扩张、兼并、征服、抢掠其他民族和地区，这是民族之间战争的根源。民族之间的战争，表面上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对抗，实质上是不同民族统治集团之间的对抗，各民族的劳动人民往往都是实际受害者。另一方面，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存在着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发展，在客观上要求建立正常的农牧产品交换，结束游牧民族对农业民族的掠夺和侵扰，进而要求实现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和睦。因此，那种以掠夺和维护分裂割据为目的的战争是侵略性的、非正义的战争，而以确保边境安宁、实现国家统一为目的的战争是正义的、进步的战争。总之，对历史上民族之间的战争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进行具体分析。然而，三本书的作者却不是这样。对我国历史上匈奴、突厥等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之间的战争，作者不是把它放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去分析，也不去分析其中的不同的统治阶级集团之间、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实际利害关系，而是刻意告诉人们：匈奴、突厥等游牧民族是维吾尔人的祖先，所以他所进行的战争，包括掠夺性的战争，破坏大统一的战争，统统都是进步的、正义的战争；而中原王朝是

汉族，他所进行的战争，包括反对掠夺的战争，有利于大统一的战争，就都是“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难怪作者在《维吾尔人》这本书里，把赞成维护国家统一和主张民汉和好的历史人物，都骂作“叛徒”，而把反对国家统一，反对中原王朝的人，说成是“狮心英雄”，而且要那些“为了人民的解放和独立而斗争和正在斗争的人们”，象“狮心英雄”那样，去为他所谓的人民的“解放和独立”而进行“斗争”。一褒一贬，作者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不是很清楚了吗？

总之，三本书的错误是严重的。它以学术著作的面目出现，放肆地鼓吹和散布以民族“独立”为核心的一系列分裂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的思想观点，带有很大的欺骗性。三本书作者的思想体系、理论观点和政治立场与泛突厥主义分子穆罕默德·伊敏完全一致。所以我们说，三本书作者的错误，不仅仅是学术观点上的错误，而是政治立场、政治观点错误。对此，不能够等闲视之。

这里顺便强调一个问题。我们历来认为，维吾尔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有着值得自豪的悠久历史，在创造中华民族文化、开拓祖国疆域、缔造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过程中，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维吾尔族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新疆历史的重要方面。搞好维吾尔族历史的研究，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自治区社科、文化界的光荣任务。现在有人认为，三本书问题是不同学术观点的问题，说作者是维吾尔族历史的专家，是在发表一个维吾尔学者个人的学术观点。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许多专家的发言表明，作者根本不是什么“认真负责”，“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对待历史”，写出了维吾尔族历史的“真面貌”，而是在歪曲历史、编造历史和抄袭伊敏的《东突厥斯坦历史》，是在有意识地宣传某种政治观点。对这样的所谓历史著作，我们如果不开

展必要的讨论和旗帜鲜明的批评，任其错误流传，那我们就是对维吾尔族历史研究的极端不负责任。我们对《维吾尔人》等三本书的批评，还维吾尔族历史的真面目，这才是对维吾尔族历史的真正尊重和肯定。

二、“三本书”给我们的思考

三本书于1986年至1989年，在我区两个出版社先后出版发行，使其错误观点流毒全疆，造成了恶劣的后果，其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主要的教训是三个问题：

1.三本书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在新疆传播和影响的产物，是《东突厥斯坦历史》这一分裂主义的代表作在今天的翻版。三本书的出现，不仅有它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而且有它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思想理论根源。新疆的民族分裂主义思潮，是以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为其思想理论基础的。只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把对三本书的批评同肃清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及其代表作《东突厥斯坦历史》的影响结合起来，才能切中要害，抓住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的反动思想实质，把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教育进一步引向深入。

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是在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叶在土耳其先后兴起的社会思潮，它代表了反动的毛拉和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其特点是抹煞阶级矛盾，主张把一切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和突厥语系的诸民族，组成大伊斯兰帝国或大突厥帝国。这两种社会思潮是随着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入侵而传入新疆的。当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新疆就成为各帝国主义势力争夺的一块重要地方。他们同新疆境内的分裂主义势力纠合在一起，以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作为反动的思想武器，疯狂地进行分裂新疆的活动。穆罕默德·伊

敏就是这样一个鼓吹和积极推行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头子。1933年他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墨玉县组织暴动，打下和阗，自称“和阗王”，而后再同沙比提大毛拉一起，在喀什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宣称“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是一个“永久独立”的国家，“要反对突厥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但是这个短命的反动政权，仅仅存在三个月就遭到了彻底覆灭，穆罕默德·伊敏随即亡命国外，于1940年出版了《东突厥斯坦历史》这部反动著作。

《东突厥斯坦历史》是一部向新疆鼓吹和移植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代表作，集反动的政治观、历史观、民族观、宗教观之大成。它极力拔高所谓“突厥民族”的历史地位，任意夸大所谓“突厥国家”的疆域，肆意鼓吹所谓“共同的突厥文化”，煽动大突厥主义的狂热。它把帝国主义带有明显侵略意图的“东突厥斯坦”这个概念强加在新疆头上，宣扬新疆是“世界上最古、最有名、文化最早发展”的“独立国家”；否认新疆自西汉以来即是我们伟大祖国的一部分；宣称要“增强”东突厥斯坦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宗教观念”；煽动新疆各族人民“集中力量”、“努力奋斗”，“永远脱离中国的束缚”；它恶意歪曲新疆历史上各少数民族同汉族之间的关系，完全否认汉族同各少数民族友好交往、和平统一的历史发展主流，把这种关系说成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把汉族当作各少数民族的敌人等等。其反动观点集中起来就是这样一个口号，即：“我们的民族是突厥，我们的故乡是东突厥斯坦，我们的宗教是伊斯兰”。说到底，就是要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统一，妄图在新疆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这样一个“独立国家”。几十年过去了。今天，国外的敌对势力还在利用各种途径向新疆进行渗透，继续宣扬《东突厥斯坦历史》的一系列反动观点；新疆的分裂主义势力也把这本书奉为至宝，吹捧为“科学的历史巨著”，并秘密打

印散发，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思想混乱。现在，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三本书”，虽然没有象《东突厥斯坦历史》那样明白地提出东突厥斯坦问题，甚至用几句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装扮自己，但其基本的政治立场、理论观点和《东突厥斯坦历史》是一脉相承的，是《东突厥斯坦历史》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的翻版，因而也是有害于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这一切表明，《东突厥斯坦历史》在政治思想上是反动的，至少在有些人的思想上包括三本书的作者在内，其影响是很深的。对于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来说这本书实际上已经成为其进行反革命行动的指南。巴仁乡的反革命武装暴乱事件，突出地证明了这一点。

历史的经验教育了我们，对于反动的东西，不经过批判斗争是不会自己退出历史舞台的，它会毒化我们的空气，腐蚀人们的灵魂。现在是到了彻底批判《东突厥斯坦历史》并肃清其流毒的时候了，只有把对三本书的批评同对《东突厥斯坦历史》的批判联系起来，才能看清三本书错误的严重性，才能够解决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把民族分裂主义势力赖以存在的精神支柱连根拔除，教育我们的干部群众，团结一致，把社会主义的新疆建设得更加美好。

2.三本书的问题也反映了新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是新疆分裂与反分裂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突出表现。它再一次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仍然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无论是革命的阶级，还是反革命的阶级，要夺取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反映出来，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然，夸大这种斗争，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是错误的，但是，无视这种斗争，看不到这种斗争，同样也是错误的。

新疆解放以来的历史表明，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一直没有停

止过。尽管各个历史时期的斗争形式不一样，一切分裂主义活动的共同的特点都是以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作为其精神支柱，以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为目标，从而使斗争的焦点始终集中在分裂祖国统一还是维护祖国统一这一根本问题上。尤其是近几年来，在国外的大气候和国内的小气候的影响下，随着国外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新疆进行渗透、颠覆破坏活动的加剧，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势力遥相呼应、蠢蠢欲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三本书相继出版发行，通过对历史的歪曲、篡改和伪造，散布了大量损害祖国统一、危害民族团结的错误观点，客观上起到了适应国内外民族分裂主义活动的政治需要，从根本上违背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这难道不值得作者扪心自省吗？

三本书的问题为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保持清醒头脑，坚持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阵地敲响了警钟。当前，自治区意识形态领域总的是好的，但在政治思想、民族宗教、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不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尚未彻底清除，民族分裂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等方面的思想影响，也程度不同的仍然存在。如果我们对这种形势认识不足，不去坚持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占领一个又一个阵地，那我们就可能犯极大的错误，以致影响自治区稳定与发展的大局。所以，希望各级党委特别是意识形态各部门的主要领导同志，一定要坚持不懈地把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工作抓紧抓好。要经常掌握和分析不同阶层的思想状况，抓住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彻底弄清楚，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扎扎实实地予以解决，以保证意识形态领域的每一块阵地，都能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

3. 三本书的问题还告诉我们，提高各族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政治敏感，增强政治原则性和政治坚定性，是何等的重要。对三本书的问题，有的同志觉察到了，有的同志没有觉察到，个别的同志甚至还盲目吹捧。这个问题不解决，今天出版了这三本

书，明天也许会出版另外一些什么书。这不仅仅是出版部门的问题，而且是我们整个思想战线上都应当认真对待的问题。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从根本上来讲，是我们一些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底很不扎实，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真正学到手，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等基础的理论还缺乏系统而深刻的理解。结果，理论上的含混不清导致了政治上的摇摆不定，以致在大是大非面前模棱两可，迟疑犹豫、拿不定主意，使得一些有错误的作品、妨碍民族团结的作品以及其它不健康的作品得以通行无阻，任其腐蚀毒害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这种情况提醒我们，一定要以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对各族人民负责的高度政治责任感，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有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联系实际而不是教条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邓小平的著作，学习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把我们的政治敏感性、政治原则性和政治坚定性大大地提高一步，把我们思想战线上的各个部门的工作做得更好，为我国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

三、从正面教育入手，彻底肃清“三本书”的流毒

鉴于《维吾尔人》等三本书的严重错误和它在社会上已经和可能造成的严重危害，根据区党委的部署，在这次讨论会之后，还要抓紧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要充分利用三本书这部绝妙的反面教材，结合党的中心工作和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有计划、有目的地对全区各族干部、群众、青年学生进行一次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正面教育。各地、

各单位可以根据这次讨论会上王恩茂同志、司马义·艾买提同志以及宋书记、铁主席、贾书记等领导讲话的精神和大会提供的批评材料，通过举行小型座谈会、历史问题讨论会、报告会等多种形式，以正面教育为主，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妥当地指出三本书的严重错误，逐步肃清其在干部、群众中的恶劣影响。要把教育活动同今年五月份进行的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贯穿到经常的宣传工作和对干部、群众的政治教育中去。要通过教育，进一步解决一些人在新疆历史问题上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深层次的思想理论问题，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历史观，把全区广大干部、群众的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的教育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二是要进一步加强新疆历史以及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和宣传，使各族人民正确地了解新疆历史以及少数民族史。这是从根本上消除《维吾尔人》等三本书散布的错误观点，从思想深处确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历史观的不可缺少的工作。对此，各有关单位要从战略高度作出长远的安排和部署。一方面，对这次讨论会上提出的涉及民族关系史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比如：关于民族形成问题、关于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概念和含义问题、关于国家的统一和分裂以及民族之间的战争问题、关于历史上的爱国主义者和叛徒问题、关于民族关系中的主流和非主流问题，等等。要本着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从理论和实践的相结合上，把问题研究的更深一些，把被三本书搞乱了的理论是非重新纠正过来；另一方面，也要抓好具有普及性和可读性的关于新疆历史的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出版工作，特别是抓好已经开始的五十本新疆历史小丛书的选题和编写出版工作。对于近年来国外流入我区的有关新疆历史、民族和宗教等方面的著作，有关单位也要组织专门力量，加强研究，提出对策，坚决抵制国外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对我区的渗透。

三是要抓好对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新疆历史以及少数民族史的基本知识教育。已经查明，《维吾尔人》等三本书在我区部分青年和学生中广为流传，成了热门货，并使极少数青年学生上当受骗，走上了反革命道路。这件事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这次讨论会之后，自治区教委要尽快组织力量，为我区各级各类学校学生分别编写新疆历史基本知识的乡土教材，并切实把它纳入教学计划，逐步组织实施。各级党校、干校也要统筹安排，做好这方面的教育工作。

四是各新闻单位和自治区主要学术刊物、大学学报，要按照区党委的部署，对《维吾尔人》等三本书及其作者公开点名批评，现在就可以作点准备。要重在说理，不在于戴许多帽子，不搞政治运动，不搞一般表态，切忌简单粗暴。公开报道和点名批评不要一窝蜂，不搞突击，而要结合各项中心工作，作出较长期的安排。批评文章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注重效果，立足于团结教育更多的人。这次讨论会上一些优秀论文，经过修改，可以在新疆日报和有关社会科学刊物上陆续发表，各地不要抢先。

总之，要通过各方面有计划、有步骤、扎扎实实的工作，既要把《东突厥斯坦历史》批倒批臭，使之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又要使大家对《维吾尔人》等三本书的错误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从而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增强团结，齐心协力为实现自治区今后十年第二步战略目标，共同努力。

《维吾尔人》等三本书存在的 主要问题及其错误性质

经过审读和讨论，各民族的专家、学者和其他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吐尔贡·阿勒玛斯的《维吾尔人》、《匈奴简史》和《维吾尔古代文学》等三本书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在维吾尔族与中国、新疆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上，作者极力鼓吹民族“独立”和分裂主义的思想观点。

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证明，我国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共同开拓了伟大祖国的疆域。维吾尔族的历史和匈奴、突厥等的历史都是我们伟大祖国悠久历史的一部分。但是，三本书的作者不顾历史事实，认为在历史上维吾尔族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一个民族，历史上所有生活在我国北方和新疆的少数民族都不是中国的古代民族，都有着独立于中国之外的“独立国家”。《维吾尔人》一书明确地告诉读者：维吾尔“这个民族最初是他们自己的祖先和同胞匈奴人的大乌古斯——匈奴单于国、大蓝突厥汗国的组成部分，后来则建立了鄂尔浑回纥汗国、喀喇汗国、回鹘亦都护汗国、坎苏回鹘汗国、叶尔羌（赛义德）汗国等强大的国家。”三本书的作者不仅把匈奴、突厥等我国古代民族的历史直接当作了维吾尔族的历史，而且又明确地把匈

奴、突厥的历史当作中国之外的历史来讲。他将南迁的匈奴称之为“匈奴向中国的迁徙”，说匈奴等古代民族“迁入长城之内，在中国建立了国家”。在写到唐朝和突厥的关系时，更是露骨地说“有时突厥越过长城侵入中国的疆域，有时中国军队也越出长城侵入突厥疆域”。这清楚地表明，他根本不把匈奴、突厥等看作是生活在中国古代北方的古代民族，也不把匈奴、突厥生息和统治过的地方看作是历史上中国的领土。

为了鼓吹民族“独立”的思想观点，三本书的作者掩盖史实，歪曲和杜撰历史，极力否认古代维吾尔族建立的政权与我国历史上的中央王朝有着从属性质的关系。比如，古代维吾尔族在漠北建立的鄂尔浑回纥汗国，先后总共有过十五位可汗，除最后三位可汗因更替太快来不及报聘请封外，其他十二位可汗都受到唐朝的册封。这清楚地表明回纥汗国是臣属于当时的中央王朝的。但作者对这方面的史实根本不提，反而胡说什么“极为强大的、独立的回纥——鄂尔浑可汗国，在当时同亚洲的大国——唐朝和吐蕃处于平等的地位”。再比如，由回鹘、葛逻禄等建立的喀喇汗王朝，其众多的可汗都自称是“桃花石”汗，以表明自己是中国的可汗，喀喇汗王朝是中国的一部分。“桃花石”一词，据中外史学家考证，应解释为“中国”。著名的《突厥语大词典》对“桃花石”一词就作了明确的诠释，指出：“桃花石——此乃摩秦的名称。秦距离契丹有四个月路程。秦本来分为三部：上秦在东，是桃花石；中秦为契丹；下秦为八儿罕，而八儿罕就是喀什噶尔。但在今日，桃花石被称为摩秦，契丹被称为秦。”秦便是中国。《突厥语大词典》的作者马赫木德·喀什噶里本人是喀喇汗王朝可汗家族出身，他的这段诠释清楚地告诉后人，他自己所在的王朝即喀喇汗朝与当时的辽、宋两个王朝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三本书的作者一方面对《突厥语大词典》给予了极为高度的评价，另一方面却不顾文献和史实，别有用心地歪曲“桃花石”一词的含

义。他说：“桃花石”不是指中国，“桃花石汗”也不是指“中国汗”，“桃花石”系“依附”、“附属”之义，而且“中国在其历史上的许多时期，的确依附于她北部的匈奴国和突厥国而处于附属地位（状态）。”

为了把维吾尔族的历史歪曲成中国之外的“独立史”，三本书作者还反复告诉人们说：维吾尔人的祖先和同胞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曾建立了大乌古斯帝国——大匈奴单于国（公元前220年至公元216年）、欧洲匈奴帝国（公元375年至468年）、白匈奴（唃哒）帝国（公元420年至565年）、大蓝突厥汗国（公元551年至745年）、鄂尔浑回纥汗国（公元646年至845年）、高昌回鹘王国（公元850年至1335年）、维吾尔喀喇汗王朝（公元850年至1212年）、伽色尼王朝（公元960年至1187年）、大塞尔柱苏丹国（公元1040年至1157年）、花喇子模王国（公元1172年至1231年）、赛义德王朝（公元1504年至1678年）等伟大的、强有力的、富有的、文明的国家”。他还在书中强调这十一个汗国、王国、帝国的疆域，以及回鹘西迁后漠北契丹和蒙古帝国的疆域：“东面扩展到了大洋之岸，占领了库页岛西至黑海，……甚至连甘肃也在汗国的疆域之内”，“东到现在的兴安岭以东……南到长城”，“东至日本海……南至中国陕西、河北、宁夏等省的北部”，“东起太平洋、西至多瑙河入海口、北起西伯利亚草原，南至小亚细亚”，等等。总之，以长城为界，在“中国”以北甚至“中国”的北部边境，存在着一系列维吾尔人及其祖先和同胞所建的汗国和王国，或者是后来的契丹和蒙古帝国。三本书作者上述观点的严重错误首先在于，他实际上是坚持认为“中国”只是指汉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汉、唐等王朝，“中国”的疆域仅仅限于长城之内，进而也就把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我国北部西部地区的历史从中国的历史中割裂出去。此外，所谓维吾尔族的祖先在历史上建立过十一个“强大国家”的观点也完全是作者的杜撰。匈奴单于国、突厥汗国是我国古代匈奴人、

突厥人建立的政权；历史上西迁的匈奴并没建立过什么“欧洲匈奴帝国”；所谓“白匈奴帝国”、“伽色尼王朝”、“大塞尔柱苏丹国”、“花喇子模国”等，这些政权不仅与古代维吾尔族没有关系，而且也不属于中国历史的范围。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今天我国史学工作者在写新疆历史和维吾尔族历史时绝不容忽视的政治历史结论。对这一要害性问题，三本书的作者从两个方面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观点。一方面，作者在《维吾尔人》等书中，根本不提自西汉以来各中央王朝在西域设立都护府等军政机构这样重大的历史事实，不提中央王朝同西域诸地方政权之间的辖属关系，不提新疆正式隶属于汉朝版图，而是去讲西域“归入匈奴国”，“准噶尔和塔里木盆地当时已入鄂尔浑回纥汗国的版图”，等等。另一方面，作者完全不顾新疆古代居民民族成分、社会发展状况和古代维吾尔族形成及迁徙等方面的历史事实，毫无根据地说什么“在公元前177年”之前就已经有了“塔里木盆地诸维吾尔汗国”。

从上述民族“独立”和分裂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作者把历史上凡是赞同和维护祖国统一的本民族的人物都说成是“叛徒”，把他们的行为统统斥之为“走上了叛徒的道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而把搞分裂的人物当作民族英雄，极力鼓吹所谓的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解放。例如，《维吾尔人》一书中，作者把公元639年入唐朝为官的突厥贵族结社率，因“居家无赖”、诬告其兄长和“久不进秩”而引起的谋刺李世民的事件，说成是爆发在封建社会的“东突厥的解放运动”。把结社率说成是“品格高尚的狮心英雄”。与此相反，把其他一些归附中央王朝的突厥贵族说成是“叛徒伯克”、“跳梁小丑”、“秃头贵族”等等。在《匈奴简史》中，作者把敌视汉朝、搞分裂的西匈奴呼屠吾斯单于捧上了天，说“在匈奴的历史上，呼屠吾斯是一位仅次于巴图尔单于的天才的军事

战略家、刚毅的、自负的、爱国主义单于”，是“不可战胜的英雄”。相反地，作者把当时归附于汉朝，为塞北与中原的统一、汉匈两族的团结作出贡献的呼韩邪单于说成是“叛徒”。

三本书的作者还尽可能地把历史同今天的现实联系起来，借古喻今。他把自己编造出来的所谓“东突厥的解放运动”的“英雄”结社率，说成是永远活在“为了人民的解放和独立而斗争过和正在斗争的人们的心里。”在另一个地方，作者还公然提出“我们应从喀喇汗王朝的历史中吸取”“最重要的沉痛教训”。他指出：

“如果公元1040年统一强大、文明的喀喇汗王朝不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喀喇汗王朝的话，绝对不会在其以后的历史上”成为别国的附庸，“反而会世代长存，以一个十分强大国家的姿态为中亚以及东西方的历史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其后代也会自己掌握自己领土的命运”。

二、歪曲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散布不利于民族团结的错误观点。

在三本书中，作者把我国历史上的中央王朝同中原地带的汉族政权完全等同起来，把汉族人建立的封建政权与汉族人民完全等同起来，认为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中原地带的汉族政权和人民同各少数民族之间始终处于充满敌意的、对立的关系之中。他编造唐朝魏徵的话说：中原汉族政权“若要安然放心，就不能允许自己周围哪怕有一个比自己强大的国家，就要让自己周围的国家都臣服。”三本书作者认为，中原汉族政权或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历来是以掠夺和侵略为目的的，在手法上采取了“以野蛮的异族扼制野蛮的异族”的政策。例如，在《维吾尔人》中，作者写道：“班超利用塔里木盆地诸维吾尔汗国相互之间的矛盾，挑动双方互斗，使他们互相争战，导致多次流血”。这样的描写是不符合

历史事实的，也是别有用心。班超的名字是与汉通西域事业联系在一起。汉通西域和在西域的行政建置，对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巩固具有重大意义。班超在西域三十多年的活动中，为协调西域各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恢复和巩固西域与祖国内地的统一，加强我国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深得当地人民爱戴。当时汉朝政府曾一度命令班超回朝，后经当地疏勒人、于阗人等竭力挽留，班超又继续留在西域，并由军司马升任将兵长史，后又升任西域都护。班超任都护达十多年之久，直至年老才返回洛阳。

纵观三本书，在看待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上，作者根本否定我国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互相交往、相融、团结这一历史发展的主流，而认为民族间的相互敌视、仇杀、吞并是民族关系史的基本方面。三本书所展示的是一部中国各民族间互相仇杀的历史。《维吾尔人》一书第三章分设了四个小标题：“匈奴与维吾尔”、“鲜卑与维吾尔”、“柔然与维吾尔”、“突厥与维吾尔”。然而在长达62页（汉译本）的这一章里，作者不是去讲述标题所显示的内容。恰恰相反，在这些标题下讲述的主要是匈奴、鲜卑、柔然、突厥与中原的战争，确切地说是与汉民族的战争。作者以匈奴、突厥是维吾尔人的祖先这一妄断为前提，不顾历史上北方一些少数民族联合汉族一起反抗匈奴统治的史实，不顾突厥统治时期回纥不断联合唐朝反抗突厥的史实，把所谓的“土拉”、鲜卑与匈奴的战争说成是“由于汉朝的挑拨离间”，还说“突厥人的敌人”“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让回纥人反对突厥人”。刻意勾画出了匈奴人、突厥人统统都是维吾尔人，而汉族人就是匈奴人、突厥人、维吾尔人的敌人这样一部民族关系史的轮廓。

三本书的作者对我国历史上汉朝与匈奴、唐朝与突厥之间的战争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评价。在谈到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时，作者写道：“如果说以前匈奴是侵略者，汉朝处于自卫防守的位置

的话，那么从公元前133年起情况向相反方向变化”。这就是说，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变成了侵略性的战争。谈到唐朝与突厥之间的战争，作者说：“这里需要就突厥与中国之间的战争的性质说几句话：两国之间的战争的性质是多种多样的，不能等而论之去下结论。有时突厥越过长城侵入中国的疆域，有时中国军队也越过长城侵入突厥疆域，不着眼于对他们实行军事打击，而是有长远打算，以占领他们的领土为目的。以侵略为目的的任何战争当然都是非正义的战争。”作者这种貌似公允的评论完全颠倒了我国历史上匈奴、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地区以汉族为主的农业民族之间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进步与倒退的性质区分。在我国历史上，北方的游牧经济与中原的农业、手工业经济是相互补充的。当正常的农牧产品交换遭到统治阶级的阻挠破坏时，游牧民便利用牧马的快速行动对农业地区进行掠夺。匈奴、突厥等游牧民族都是如此，有的就在农业地区定居下来，与农业民族融为一体。游牧民族的统治阶级也会利用马的优势发动大规模的掠夺，它理所当然会遭到农业民族的反抗。汉、唐联合西域各部、联合回鹘等部共同反击匈奴、反击突厥，其实质都是阶级斗争，而以民族斗争为其表现形式。匈奴对汉朝的战争、突厥对唐朝的战争，都是由匈奴、突厥的游牧贵族阶级发动的，是其掠夺奴隶和财富政策的继续，所以是非正义的掠夺性战争；而汉朝对匈奴的战争、唐朝对突厥的战争，则是反击侵略的战争，是战略防御性质的正义战争。

在我国历史上，中原地区的汉族与我国北方和西部的少数民族之间、各少数民族之间曾多次联姻，有的虽然发生在封建统治集团之间，但客观上有利于民族间的交往与和睦相处。但吐尔贡·阿勒玛斯极力贬低这种联姻所包含的民族团结的意义，说汉朝细君公主、解忧公主、王昭君和唐朝的太和公主等出嫁，是“中国帝王通过嫁给别国统治者的公主，能得知这个国家的内情，公主在陪同自己一道来的谋臣的指示下，进行间谍活动”；

“中国帝王通过嫁给别国的统治者的公主所生的后代的手段，为的是以后统治这个国家，使这个国家成为自己的附属国。另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公主所生王子的继承王位问题，制造矛盾，在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中制造不团结，将一个完整的国家搞得四分五裂，衰弱不堪，最后将其消灭。”

三本书的作者还特别贬低和平时期国内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汉朝将王昭君嫁给匈奴单于，他认为是“匈奴与汉之间的半友好关系开始加强了”。他还说，突厥与唐朝“这两个邻邦就是在安宁的时期，相互间的‘友好’来往也没有诚意”。“回鹘亦都护汗国同宋朝的关系，表面是似乎和睦友好，实际上彼此难以发生影响”。总之，在不得不使用“友好”一词时，他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保留。

三、无视历史实际和国内外学术界的公论，过分夸大维吾尔族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三本书的作者编造说：距今8000年前维吾尔人就作为一个民族生活于“中亚”；早在距今7000年前，维吾尔人就有了农业经济，出现了畜牧经济和农业经济并存的局面；早在距今4000年前，在维吾尔人中间文字就被创造出来了，“开始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这既违背考古学的发现，也无视维吾尔族作为一个民族所经历的由氏族、部落到民族的发展过程，以及它所要经历的由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同时，作者无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的定义和我国历史上民族形成和存在的实际，认为匈奴、鲜卑、柔然、“土拉”、塞、突厥等古代民族都是维吾尔人的祖先，维吾尔族囊括了我国古代北方的各个少数民族，进而认为这些民族的历史也就是维吾尔族的历史，以此拉长维吾尔族的历史活动时间，扩大维吾尔族的历史活动空间。作者说：“维

吾尔人的祖先在其历史上曾建立了”众多“强大的国家”，有的“国家”的疆域十分广大，如“喀喇汗王朝国家的疆域要比现在法国的领土大10倍。”它们“在亚洲舞台上象狮子一样吼叫”，“使东方和西方为之震惊”。以耸人听闻的语言抬高维吾尔族的历史地位。

在对待民族文化问题上，三本书的作者不顾自古以来各民族之间文化上的相互融汇、交流与影响的事实，根本否认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文化对维吾尔族文化的影响，把维吾尔族文化作为各民族文化之源，强调是维吾尔族文化给了世界文化以“不可估量”的影响。对于汉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作者真是讳莫如深。他在《维吾尔人》等书中多处地方都提到漠北出土的突厥文碑刻，除作了详细介绍并评价它们是“古代维吾尔历史和文化的金页银字史诗”外，还断言一定还有更多的碑刻尚未被世人发现。但是他却闭口不谈《阙特勤碑》和《九姓回鹘可汗碑》是用突厥文和汉文合刻的事实，尤其是后者，突厥文部分仅残存一小块，粟特文部分也不全，全靠汉文部分才使整个碑刻内容得以了解。作者在《维吾尔古代文学》等书中，还对《福乐智慧》作了过分的的评价，他说：“当我们谈起古代世界文学时，在谈到公元九世纪以前的诗人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塞》、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法国的《罗兰之歌》、印度的《罗摩衍那》、《玛哈帕腊达》、伊朗的《王书》等史诗的同时，我们也要提及柯尔克孜的史诗《玛纳斯》。以上所提及的史诗中没有一部能在历史和现实意义方面同长诗《福乐智慧》相媲美。”“《福乐智慧》可以称之为是几乎包括所有各种学问的完整的百科全书。”在三本书中，作者还采取附会的手法，把国际学术界公认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波斯文化范畴内的名人，说成是维吾尔文化的代表人物。他突出地反复提到了伊本西那（阿维森纳）、法拉比、比鲁尼、菲尔多西等。比如，他说：“赢得东方的亚历士多德称号的著名哲学家阿布·纳赛尔·法拉比（公元873年至950年）生于锡

尔河畔的法拉比城的一个维吾尔——噶逻禄家庭。”在这里，作者所说的“维吾尔——噶逻禄”家庭是没有史料依据的，是他的臆测。法拉比是阿拉伯哲学的奠基人，费尔多西是波斯诗人，都不是维吾尔文化的代表人物。此外，为了抬高维吾尔古代文化的地位，作者还狂妄地提出：公元11世纪在维吾尔人建立的喀喇汗王朝时期，中亚曾经出现过一个“文化勃兴”时期，“它比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还要早几个世纪”，“欧洲复兴时期如果始于14世纪，那么，中亚在文化方面的勃兴时期在喀喇汗时期（11世纪）就已经出现了。”

四、竭力鼓吹穆罕默德·伊敏之流三四十年代以来散布的泛突厥主义思想观点。

在三四十年代，泛突厥主义分子穆罕默德·伊敏等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所鼓吹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可以用他们的三句著名口号来概括，这就是：我们的民族是突厥，我们的故乡是东突厥斯坦，我们的宗教是伊斯兰教。这三句口号的实质在于把维吾尔族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划出去，变成所谓“突厥人民”或“突厥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把新疆从中国领土上划出去，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吐尔贡·阿勒玛斯鼓吹的思想观点与上述思想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作者在全书中根本不讲维吾尔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是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个民族。作者虽然不象穆罕默德·伊敏在《东突厥斯坦历史》（也即《东土耳其斯坦历史》）一书中那样把维吾尔族干脆直接叫做“突厥”，但作者清楚地指出了两条：第一，维吾尔人与匈奴人、突厥人有“血缘关系”，“在起源方面互为同胞”，“在种族方面同出一源”，“创造的文化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民族文化。”在东突厥汗国时代，“突厥这一名

称是操突厥语的种族和风俗相同或相近的维吾尔、乌古斯、柯尔克孜、克普恰克、处月、拔思密、突骑施等以及后来突厥化了的契丹等族的共同名称。从那时候开始，突厥这一名称变成了指称生活在突厥汗国疆土上的所有部族的民族联合体和政治联合体的名称。”第二，包括“新疆的维吾尔人”在内的“这些突厥人民，从地理方面讲，在亚洲从东到西和西南的连成一片、伸展开去的广阔的土地上生活着”，“这些突厥人民的绝大多数现在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他们的人口总数至少在1亿5千万人以上。”

“这些突厥人民的语言被归入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他们的种族属于白人种土兰（匈奴——突厥）型。”

关于维吾尔族的故乡，《维吾尔人》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应当坚决地断言；“维吾尔人的故乡是中亚。”然而，作者所谓的“中亚”与穆罕默德·伊敏之流所说的“突厥祖国”实际上指同一块地方。《东突厥斯坦历史》中说：“东突厥斯坦、西突厥斯坦的区域，就是突厥的祖国，……突厥祖国的界线西至黑海、北至阿他斯、东至日本海、南至黄河以及哈拉库木戈壁。上述广泛的地区是突厥的地方。在历史记载上，除突厥外，以前没有见到其他民族生存于此地。”《维吾尔人》一书虽说没敢使用“东突厥斯坦”

（也即东土耳其斯坦）这一政治概念，但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作者是心领神会的，而且也作了具体表述。他说：“维吾尔人的故乡是中亚。”“属于中亚范围内的地区与领域有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西突厥斯坦——即现在苏联哈萨克斯坦……等五个加盟共和国的疆域以及阿富汗的一部分。”说白了，作者所谓的“中亚”，就是东突厥斯坦和西突厥斯坦的代名词。

三本书的作者不仅承袭了穆罕默德·伊敏之流的泛突厥主义思想观点，而且直接抄袭了《东突厥斯坦历史》中的许多表述。比如，《东突厥斯坦历史》中说：“东突厥斯坦是世界上最古、最有名的、文化最早发展的一个国家，突厥民族是在全世界古民族

当中最古的，几千年来在世界上获得第一等地位的、对人类世界贡献很大的一个民族”。《维吾尔人》一书则说：“我们的祖先和同胞自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起，直至公元14世纪”，曾建立过十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们的祖先曾经是亚洲大陆各民族中对世界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著名民族之一。我们的祖先是中亚最古老的主要土著民族。”

《维吾尔人》一书中，作者为了否认历史上中国的中央政权对长城以北、黄河以西的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的统辖关系，特别是对新疆的统辖关系，曾强调一个重要观点：“中国在公元750年塔拉斯之战失败后，直到公元1757年这段的时间（一千年）对中亚基本没有什么影响。”但这也不是作者的首创，而是从《东突厥斯坦历史》一书中抄来的。穆罕默德·伊敏的原话是：塔拉斯之战后，“突厥人推翻了中国在突厥斯坦的政权，肃清了中国侵占突厥斯坦的势力，从此以后，在一千余年的过程中，中国武力并未侵犯突厥斯坦领土，……突厥斯坦人民一直脱离中国的侵扰，享受幸福安定的生活。”这里的要害在于，按照穆罕默德·伊敏的观点，新疆不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是在近代才沦为清朝的殖民地。这一点也正是《维吾尔人》一书写维吾尔人历史只写了半截历史的最重要的原因。作者在用大量篇幅叙述了喀喇汗王朝之后，对西辽与蒙古、元朝时期和察合台汗国时期的维吾尔人的历史轻轻带过，又将“甘州回鹘汗国”改称为“坎苏回鹘汗国”，拉出来讲了几句，然后就结束了他笔下的维吾尔人历史。作者实际上是在尽力把维吾尔人的历史写成一部维吾尔人的独立史，以此作为全书布局的详略、取舍的最高原则。

五、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歪曲、杜撰历史。

《维吾尔人》一书的出版说明中称吐尔贡·阿勒玛斯是“认真负责”、“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对待历史”，“写出了我们的历史的”“真面貌”，而实际上吐尔贡·阿勒玛斯是完全不顾历史事实和已有科研成果，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随意妄下论断、歪曲史料和杜撰历史。

三本书的作者告诉人们，维吾尔族有八千年的历史。但对这一基本结论，作者拿不出任何科学的依据。作者在书中曾多次使用新疆社科院考古所1979年在塔里木盆地发掘的两具古尸的材料。关于古尸年代的测定，1981年曾在报上发过一个尚待核实的信息，说是距今6400多年。后经权威部门反复测定，确定为距今3800年，并于1984年在《新疆日报上》作了正式更正，这一情况，国内外特别是新疆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是众所皆知的。但作者在1989年出版的《维吾尔人》中，却仍公然引用“距今6412年前”的说法，以此作为其“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的证据，来证明维吾尔人有八千年历史。三本书的作者还不顾目前中外学术界从历史、考古、语言、民族、人种、地质和地理等多方面对新疆历史地理和古代民族问题的研究成果，武断地告诉读者：“在塔里木盆地生活的最古的土著主体人民”是“维吾尔人的祖先”，9世纪40年代西迁到塔里木盆地一带的回鹘人，是“八千年前从塔里木河流域迁往蒙古利亚和贝加尔湖周围的我们祖先的后裔”。为了说明八千年前维吾尔族祖先大迁徙的原因，作者竟然断言是在距今八千年前新疆才出现了干旱的气候环境。这毫无疑问是作者的妄断。科学家们证明，塔里木盆地的干旱气候是在距今三百万年左右地壳变动后形成的。它是地质时期的产物，而不是人类历史时期的产物。（这个结论见于《罗布泊科学考察与研究》第109

页至111页。该书1987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为了鼓吹所谓的“共同突厥文化”，作者还毫无根据地断言，新疆南部和北部发现的岩画，还有内蒙境内、外蒙和苏联（中亚一带）境内发现的岩画，“无论其风格还是内容、形式方面均相同”，以此来证明维吾尔族的祖先“土拉人”与匈奴人、塞人、突厥人“在种族方面是同一个”，“创造的文化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民族文化”。在《匈奴简史》中，作者曾引用一项重要的考古发现来证明“突厥民族”的悠久文明史。他告诉读者：

“近年来，苏联人在距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首府阿拉木图五十公里的耶斯克湖附近发掘了一处城堡。在发掘中，发现了考古史上称之为‘金衣人’的一位年轻时就弃世的突厥王子的陵墓，在王子身边找到一只银碗，上边写有一些字句，据信这文字是兰突厥字母的最初形式，而记载的是突厥语。这个发现属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历史，把突厥文明的古老性又推前了。”但真实情况根本不是这样。《苏联哈萨克百科全书》第一卷第195页至198页记录了这次发掘的详细情况。哈萨克斯坦的考古学家们对发掘中出土的文字经过全面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这种文字是哈萨克斯坦的古代居民创造的文字。并报导说这种文字至今尚未能解读。由此可知，“突厥王子的陵墓”之说是个妄断。

《维吾尔人》等三本书中还引证了不少汉文史料。作者貌似比拒绝使用汉文史料的穆罕默德·伊敏等人公允、科学，并扬言，审读他的书必须要由汉文史料专家来说话，想批倒他的书必须先批倒司马迁等汉文史籍作者。作者这一手确实迷惑了不少人。但是，这次经一些专家认真查阅核实，作者在史料使用方面常常取其所需地采摘，甚至歪曲、篡改。作者对汉文史料中有明确记载的关于中央王朝对新疆行使行政管辖权力等方面的事实，完全避而不谈。作者引用的汉文史料相当一部分是从土耳其学者的论著中转引过来的，根本没有和汉文史料核对，所以张冠李戴、搞

错年代、人名官名书名混同等错误不胜枚举。更令人吃惊的是作者对汉文史料的随心所欲的解释。比如前面提到的公元639年的所谓“东突厥的解放运动”，完全是作者在附上汉文史料原文的情况下，公然篡改史料原意而编造出来的。

此外，作者的三本书，还在语言问题上作了不少文章，为其歪曲历史服务。作者把史学界通用的“铁勒”、“丁零”等改称为“土拉”，以示不用汉人起的名字；把“甘州”通过对音而附会成“坎苏”（维吾尔语：“宽宽的水”），把南疆一些古地名硬说成是维语地名，以证明这些地方在古代的归属；从“桃花石”一词的维语读音和阿拉伯语的一个词读音相似而得出“桃花石”是“依附”、“附属”之意，由此将“桃花石汗”的含义完全颠倒过来，以达到其篡改历史真实的目的。

综上五个方面，大家对三本书存在的问题总的看法是：吐尔贡·阿勒玛斯写的《维吾尔人》等三本书，是在学术研究的掩护下，鼓吹和散布分裂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的思想观点，为民族分裂主义者闹独立、搞分裂提供历史依据。其问题性质属于严重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错误。

编 辑：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
宣传部《新疆宣传》编辑室

电 话：区党委总机转342

邮政编码：830003

出版时间：1991年3月20日

印 刷：新疆新华印刷三厂

主 编：段文仑

本期责任编辑：朱慧静

0080488